



重 庆 出 版 社









重 庆 掌 故



王秉诚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重庆



前 言

著名评书艺术家王秉诚，本名刘玉声，祖籍江西卢陵县。一九〇〇年三月生于重庆，一九五三年病逝，年仅五十三岁。

王秉诚先生，在评书艺术上造诣精深，以清谈闻名，自成风格。对四川评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他不只是一个评书艺术家，而且是一位著作家。一九二六年，王秉诚先生就以“然然”为笔名，在当时的《重庆晚报》上发表了长篇警世小说《如此江州》，全稿长达三十万字，连载两年之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注意。一九二八年，又在《东方晚报》上发表了《如此江州》第二集。一九四七年，王秉诚先生用刘玉声的名字，还发表了长篇小说《巴渝春秋》。

王秉诚先生那时的社会职业是报纸记者，除了履行记者职务外，就用王秉诚的名字挂牌说书；同时，还用“阿顺”、“琅琅”的名字，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重庆风物传说。一九四八年，他将其中部分作品编辑成册，以《重庆掌

故》为书名出版，四十至五十年代，在重庆地区，流传很广，几至家喻户晓。这些掌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幽默风趣，语言流畅，既可供阅读，又可供讲述，真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遗憾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作品大量散失，现在很难找寻了。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了抢救民间文艺遗产的号召。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提供民间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同时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一九八二年，在重庆作家协会和重庆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开始搜集王秉诚先生的遗作。

历时一年，共收集王秉诚先生的作品百余篇（未包括长篇在内），近三十万字。现在选出三十六篇短小作品，辑成第一集，仍用《重庆掌故》书名出版。这些作品，不仅是优秀的民间文学遗产，而且对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原貌。仅对明显错落处作了个别校订，残缺部分，请王秉诚先生之子刘怀靖同志，根据记忆作了补充。个别标题，根据内容，也作了技术性的改动，并在该篇末尾作了附注。

这次搜集整理工作，得到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帮助，尤其是北碚区图书馆，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在此一并致谢。特别应该提出的，这次搜集整理工作，得到了王秉诚先生之子刘怀靖同志的大力协

助，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查找资料，抄录遗著，没有他的努力，这本书也是难以奉献给读者们的。

我们能力有限，水平很低，在编选工作上，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傅 则、黎民苏、蓝前华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





目 录

金竹寺在哪里.....	(1)
金子门与金鸭巷.....	(8)
东华观的由来.....	(14)
神仙口的传说.....	(18)
文峰塔由来.....	(23)
涂山氏故居.....	(26)
九龙滩.....	(29)
江北烈女亭.....	(32)
总土地.....	(38)
较场坝土地.....	(41)
风流土地.....	(44)
建文遗迹.....	(47)
冥王不在丰都.....	(49)
尿函菩萨.....	(52)
火神庙故事.....	(55)
渝城三山.....	(58)
九开八闭之故.....	(64)

何为“三将军”	(66)
三铜佛由来	(71)
独家稻香村	(75)
重庆的浴室业	(80)
重庆的人力车	(83)
重庆的川剧科班	(85)
附:	
川剧坤角的由来	(88)
关于重庆的戏院	(89)
重庆有声电影之初	(95)
重庆的第一次运动会	(99)
重庆的第一家广告社	(102)
记梅花少女歌舞团	(105)
重庆长篇小说溯源	(108)
男女杂坐之始	(112)
渝城四大名家	(116)
午饭时计	(119)
郭志达三任巴县	(122)
耿巴县(耿公达轶事)	(126)
记保芝舫	(129)
王洋人	(135)
重庆新闻界第一奇人	
刘玉声传奇	公孙龙 (138)

金竹寺在哪里

在重庆城区内的庙堂，原有“九宫十八庙，三观不出城”之说，这是很多本地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座“金竹寺”，据说乃巴渝大丛林之一。这个名称，知道的人也不少，而且尚有关于“金竹寺”的一些故事流传着，每在茶余酒后，常听见讲说起；更有不少外地来到重庆的人，习闻此名，特别提出询问。但是这一座“金竹寺”究竟在重庆什么地方呢？又是什么模样呢？却说不清楚。

其实“金竹寺”，乃是巴渝流传的一则神话，根本没有依据，更没有人到过那里，不过这一则神话讲起来相当奇趣动人，便觉有源有本，信而有征，又因为流传久远，人所咸知，就更加神乎其神了。

“金竹寺”为渝城一大丛林，建筑年代甚古，命名的由来，是因为寺内生长一种“金竹”之故。地点就在朝天门外，扬子、嘉陵两江交界之处，也就是大小河汇流的夹码水下面。若干年前，那里原是一个小山堡，凸出江面，河道并不如现在的宽大，“金竹寺”就建筑在上面。一座大石拱

桥，连接着小山堡与朝天门码头，走完码头石梯，上桥，再下桥，便到这“金竹寺”大山门外的月台坝。某一年秋季大小两河水枯，发现江心似乎有一件东西荡漾着，人们乘了小船前去察找，才知道是一个石刻的金瓜露出了水面。那就是“金竹寺”前，桥拱栏杆上的石刻饰物。并且有人不但明白瞧见巍峨壮丽、庄严伟大的庙相；更远与寺中僧人交接言谈，真个言之凿口。

这故事的产生，是在清代道光初年，四川还没有设立邮政，虽然商贾云集，人事频繁，对于信函的寄送投递，却不似今日这般便利迅捷。其时，重庆只有一家信行，招牌叫做“曾参昌”，备有专夫，往来省内各州县。一次，由成都赴重庆的信差，由东大路来渝，正走到石桥铺，不料天已入晚，虽然这里距城仅有二十余里，但是所有携带，多系各商号的汇条兑票，黑夜郊行，恐生意外，遂决定就此留宿一宵，次晨赶早。

石桥铺原是东大路上一座乡场，通衢所在，那信差上店房投宿之时，已经满号，早莫得空房了。好在那信差往来渝蓉既久，对于乡镇店房，皆甚熟悉；店主人却不过，想到屋后进的一间小房内，虽已有一过路僧人寄宿，还有一床空着，便着那信差去与僧人合号。

这个体格肥胖、慈眉善目的和尚，一副游方行脚的装扮。信差既然与他合号，彼此便闲谈起来，由此信差虽然不知道僧人是从什么地方来，却知道了他是到巴县西里华岩寺去的。僧人也知道了信差明晨便要到达重庆，即由所带的背

夹内取出一封信来，请托顺路代交。僧人还说：“彼此能在今宵相遇，又能同住一处店屋，又是合号，实属缘法。”信差认为这是一件顺路之便的小事，极口允诺，愿意帮忙，接过信来一看，封面写着的是“交渝城朝天门外，金竹寺，某某大师收”，更觉交送方便，因为重庆“曾参昌”信行，地址在城内陕西街，距离朝天门甚近。

跋涉长途的信差，是非常疲劳的，明晨又须早起，所以先自睡觉了。半夜里，信差曾经醒过来一忽儿，他看见那僧人并未睡下，却是盘着双脚，在床上闭目参坐。最令人稀奇的是，正当腊月寒天，僧人竟脱去了外衣，赤裸着上身，丝毫不觉得冷冻。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那僧人竟受了体戒：由胸腹绕围两肩，显明的露着一圈火的戒疤，好似挂着朝珠一样。

次日晨早，那信差便起身预备赶路，他以为自己是最先动身的一个，却未料到，更有早行者，僧人已经先行离去了。这也是很寻常的事，信差并不感觉怎样稀奇；各自上路，直趋重庆。

二十余里的途程，不需要多少时间，那信差很快的便到达重庆。依照信行的规矩，先把信件向行里交缴清楚，了结自己的手续责任，公事即告完善。于是洗澡吃饭，舒展一下长途跋涉的辛劳，直到当天下午，他才忽然想起僧人托带的那一封交“金竹寺”的信件，好在已经空闲，便信步走向朝天门外去。

那信差满以为这是一封交送极为方便的信，朝天门是大地名，“金竹寺”既是一座丛林，自然为显著的庙宇，投递

不会困难的。万想不到，到了朝天门，却遍问不得。当地的人们，根本就没有一个知道哪里有“金竹寺”这座庙宇。他觉得诧异了。但是自己终以为这“金竹寺”绝对不会没有，也许是一座小庙堂，并不十分为人注意，所以寻找艰难，他只得自行觅找。走遍了朝天门外所有地面，右至东水门，左迄千厮门，结果依然不得其处，甚至“金竹寺”这一个庙名，也无人知晓。

费了很久的时光和不少气力，那一封信，终于不得其寺而投。那信差还是不以为怪，他认为这是不熟悉的缘故，决定不再枉自劳苦了，把那一封信带回信行，转托行里交送本地函件的同事代为投递，岂不就行了么。这个主意是不错的，于是折返城内，打算转归信行，哪知天色早已入晚。在那时候，城门每到夜间二更便要关闭，除掉官衙的差事，任何人皆不能通行；信差只顾探问“金竹寺”的所在，却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迟晏，及至返身折回，方才明白已经关城，不得其门而入了。

朝天门外大码头，靠左右两侧的竹棚房屋，早年都是开设的小客店，每当天色入晚，挨门接户全挂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长方灯，每一家的柜台上，还照例燃着用白纸糊罩的三角灯，这是所谓“鸡毛店”的特别标志。那信差便投向一家店里住宿。他在柜台前，办好了写号落名、给钱、领被盖手续之后，偶然想到店房主人是长居此间的，谅必知道“金竹寺”的地点，于是他就向柜上的人询问起来。

出乎意料的，店房主人竟也不能答出，并且说：“我们

由祖上一辈，就在这里开店住落，算来三代，已经一百多年了，却未听说朝天门外有什么‘金竹寺’呀。”

那信差无奈，只好仍待明日照想定的那个办法去办。他已经疲倦，打算抱起被盖进房睡觉；哪知他和店主人的谈话，着旁边长木凳上坐的好几个闲人所听到。其中一人，忽然对他说，“金竹寺！你看，那不是正有金竹寺的人来了么？”一面说，一面还用手向店房外边指去。他旋即转头向外，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瞧见有人提了一对圆灯笼，正朝码头上面拾级而来，圆灯笼上，明显的映着三个红色大字：“金竹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真使那信差高兴极了。他自然不肯放过机会，急忙跑去迎着来者。及至彼此接近，才看清楚提着圆灯笼来的，正是一个和尚。他向其诉明来由，及寻觅之苦，叩问道：“宝刹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和尚听罢，很从容的返身指着下面答道：“那不就是金竹寺么！”他又顺指处望去，这可更使他发呆了。

近在眼前，一座巍峨宏丽的庙宇，矗立在一处凸起的小山顶上。正面大门外，为一宽阔的月台，有石桥接连着码头石级尽处，由此直通庙内。至于庙的两厢和后背，以及月台的周围，却都是参天的丛林，庙宇伟大而壮观，宝顶似乎是磁郭铜瓦，光彩昭然，触目生动。那信差瞧着，又是怪异，又是高兴。高兴的是，毕竟寻到了这“金竹寺”的所在；怪异的则是自己未免太忽略，就在近处的一座大庙，居然费了那么多力气不曾找到；尤其是此地人们，也竟会一个都不知道。

他别了和尚，立即前往，下完码头的石阶，经过那座大

石拱桥，再穿过光滑平坦的月台，便到了寺前的大门。只见庙内的正殿大廊悬挂着一列珠灯，照耀明朗，殿内隐然有钟鼓褥罄的声音传出，也许正在做着法事；殿前廊下，不时有僧人走过，个个静默而行，没有丝毫乱混的声响。真是严肃圣地。那信差站在门外，只顾瞻望，不便走进。忽然一个沙弥看见了他，很奇怪似的走来询问：“到此何事？”他即说明来由，并取了那封书信，交与沙弥，请其代为转递，这事总算办完善了，他赧即返身，预备离去。

可是他心里不免感觉奇怪，怎么这样宏大一座丛林，竟会无人知道呢？他一面走着一面各处张望，便又发现一种奇妙的东西，就是庙的周围，所有丛林全是植的竹子，并没有一丝别的杂花草木混生其间。特别是竹子的颜色，非绿而为黄，且金光闪闪，俨然黄金一般。他想自己常年过州走县，也曾跑了很多地方，看过不少种竹子，却从来未遇见过这等金色的竹，真可算得异品；正好折取一枝，也可当作证据，给人们看看自己终于找到了“金竹寺”，并非冒假。他如此想着，便顺手采折了一枝带回店来。这时夜更深了，店房里的人大多睡去，他也各自走进房内，把那竹枝随意地藏在枕下，倒身床上。

小客店里清晨照例是起得很早的，信差更习惯于见亮即起，可是信差起身出来，店房主人却已经比他先在了。他忍耐不住，用责备的口气向店房主人谈到“金竹寺”，质问道：“昨夜我终于找到了那里，并且就在你们店房的右手下面，近在咫尺，为什么我特地请问你，却反而回答说，三代

一百多年来都在此处，却从不知有这样一个庙宇呢？”店房主人听了他的话，竟大不服气的反问道：“真的有‘金竹寺’，你昨夜还到过那里么？而且就在我们店房下面吗？”说着，便用手向外面下边指着：“请你仔细看清楚，那是金竹寺吗？”那信差更不服气的立即向下一观，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可把他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讲话了。

原来下面乃是茫茫的大河，正是扬子、嘉陵两江交流之处，不但没有什么庙宇，连小山堡、石拱桥也杳然无迹。然而信差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夜实实在在是去过那里的，一切经过都很明明白白，怎么仅隔一宵，竟有这样神奇莫测的大变化呢？他弄得惊诧莫名，无以自解。店房主人不免笑他神经混乱，言语无稽，就是旁边的人，也无不认为是胡讲瞎道。

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东西，可以给他帮助证明，立即从枕下取出了那一段金色竹枝来，以示自己所说并非虚诞。哪知这时再看那竹枝，却并非植物，乃是一枝真正的黄金竹子啊！于是人们都认为遇见了神仙，到过了仙境，不但是缘法，而且是造化。这一枝金竹，正是神仙托他交信所付的酬劳，可算一件宝贝。

关于“金竹寺”的存在，就是由这神话传述而来。还有人说，那信差在石桥铺所遇见的僧人，乃是“华岩寺”丛林开山的圣可祖师，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为“华岩寺”每年传戒的时期，圣可祖师许是回山主持法会，因此留下了这样一个事实。

金子门与金鸭巷

神话传说，流行各地，而任何一地，又各有其特有的神话传说，内容情节，虽不免涉及迷信无稽；但也有不少关系地方历史，反映一般人民的爱憎，和表达善良愿望的内容。查其来由，也并非事出无因。旧时神怪之说，甚为风靡，不但一般人相信，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也为之记叙传述。于是，更显得确有其事，辗转流传，俨然事实了。

渝城金紫门，相传为巴渝金库所在，亦即天财地贮之所，故又写作“金子门”。因为由这里出城向右不远，正当城墙下面，有一带如刀切斧劈般雄伟高峻的石崖，崖下丛生灌木野花，在石崖高处，有一道圆形石纹，本系天然形成，很象一道门户，这便是“金库”的大门。至于库内是什么样子，贮藏了多少财宝，则从来无人进去看过，不得而知。只道库内藏有一头金牛，并有专门担任守卫金库的天神保护；一般人是无法看见的。那么，人们又怎样知道金库里有一头金牛呢？原来，在清代闭关自守政策下，中西隔绝，一般人视欧美人为异物，称为“洋人”；并传说“洋人”具有特异功能，

能识宝物。于是乎见其深入内地，便认为是来寻探宝物、盗取珍异的。上述说法，也并非纯属无稽，外国人确有盗取我国文物古籍的，于是愈传愈真，“金牛过江”便是本地民间盛传的这类神话故事之一。

南纪门外的珊瑚坝，搭着不少席棚竹屋，自来便为贫苦人聚居之处，又当码头渡口，在枯水季节，便形成一条河街。这里住着一对孤苦伶仃的老夫妇。这对老夫妇没有亲戚儿女，就此二老，相依为命，靠推豆腐售卖维持生活。每天老婆婆在家煮豆浆，老头儿则挑着上街售卖，清早出门，午后归来，苦挣苦活。

一天午后，已近夕阳西下。老头儿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劳累了一天，慢慢返回家去，正经过满地卵石的河坝。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无意中看见有一个大鹅卵石，颜色黄紫，光滑闪亮，十分可爱，平日极少见到，心想捡回家去，镇压床席，倒顶合适。于是，老头儿俯身拾起，顺手放在豆腐筐里，挑回家去。

这个卵石放在床头，已经数月了。白天用它来榨豆腐，晚上用它来压席角，两老并未怎样珍视它。哪知一天上午，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从南岸渡江入城，来到珊瑚坝河边，拄着手杖，沿河街缓步而行。到得豆腐棚前，他忽然停住不走了，象发现了什么稀奇似的，不住地用眼向棚子里瞻望，并走进棚里去，指压在豆腐箱上面的那个大卵石问道：“这东西可以出售么？”老头儿心里揣想，他买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呢？忽然记起人们平时谈起洋人识宝的事，也许这卵石是什

么宝贝，所以他才愿意出钱购买，便随口答道：“可以卖，要一百两银子！”哪知洋人听了，十分高兴，并不还价，要老头儿带着卵石，一同到他家里去取银子。

到了那洋人住处，放下鹅卵石，洋人付了一百两银子。老头禁不住好奇地问道：“你花这么多银子，买这个石头儿有什么用处？”洋人哈哈大笑着道：“值得，值得。这卵石是打开金库的钥匙，有了它，重庆金库的财宝便全都属于我了。你说，一百两银子买它不挺值得么？”老头一听这鹅卵石是打开金紫门外金库的钥匙，洋人有了它，金库的财宝便全归他了，这还得了？便抢过卵石，抱在怀里，把一百两银子放还桌上，口里说：“我不卖了。”

洋人不依，二人便到了县衙门，请县大老爷裁判。县官听说是关系到洋人的官司，连忙升堂问案，询明原委，便判道：“洋人最守信用，老头既将卵石卖与洋人，岂有再收回之理？着卵石仍归洋人，所付一百两银子，亦罚还洋人，以示赔礼道歉，辨明是非！”

那洋人得到卵石之后，正待第二天晚上前去盗取金库的财宝，库里那头金牛，却已经受到专司看守之神的保护，离城到对河南岸去了。洋人手持卵石，叫开洞门，结果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找到，枉自劳力费神一番。

那天凌晨，金紫门外大码头，忽然有人呼叫渡江。当时，每晚二更以后，各码头即告收渡，但有专门值班的渡船，名为“差船”，听候官府差遣，以便有要事或传送紧急公文时，官差渡江之用。“差船”虽然专为官府准备，但在平时情况

下；既然有船夫在此通宵值班守候，遇到一般平民百姓有急事要求过江也同样给予摆渡，反正收取船资；不过，因为是在夜间，又是专船往返，收费高于白昼而已。金紫门对岸上坡，便是南城坪，深夜偶尔有人过江，并不为奇。

守候差船的船夫听见有人呼叫渡江，口音不象是官府的，而且天气寒冷，在睡梦中被叫醒，本不十分乐意；便答说若要过江，须付来回包船费。哪知岸上满口答应。船夫无可推说，只好起身摆渡。

半夜后，寒雾漫漫。渡船搭上跳板，才见上船来的人，原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汉子，庄稼人打扮，身后牵着一头黄牛。船夫心里很不高兴，因为牛大且重，容易把船踩漏；再者，推起来也很吃力。但既已答应摆渡，此时也不好推拒，只好照应这一人一畜上船站好。

船只离岸，向上游撑了一段，便向对岸划去。那中年人牵着牛鼻绳，站在舱里，默不作声。船夫心想，这么夜深，还牵牛过河，况且从城内牵往乡村，真是古怪，忍不住问道：“老兄从哪里来？这么晚牵着牛到哪里去呢？”

那人淡淡的答道：“这是主人养的放生牛，我是受雇照应它的。主人听说有人要来盗取，因此叫我牵到南岸喂养一段时间。”

船夫听了，深信不疑，便不再问了。两人一面摆谈，一面推桡，小船到得河心，黄牛忽然拉起粪来，登时撒了一舱板牛粪。牵牛的中年汉子忙向船夫表示歉意，连道半夜劳神辛苦，又把船弄脏了，很是过意不去。船夫本来有些不高兴，

听他这么一说，不便发作，便说：“没什么关系，靠岸后你各自上坡，我舀水冲洗了就是，河下顾不了这么多。”

一会儿船靠岸了。船夫搭好跳板，让那汉子牵牛上岸。此时雾更大了，船夫用篙尖倒钩抓住岸边乱石，好让人畜安全上岸。哪知中年人却头也不回，牵着牛对直向坡上走去，并不提付给船钱的事。船夫丢了竹篙，急忙追去，却踪影全无，十分生气，暗想这是安心不给船钱。返身回到船上，一眼瞧见舱里的牛粪，更觉冒火，分文未得，还要打扫船舱！边气边卷起衣袖，用水箕槽斗（一种木板做的，专为舀出舱中积水之用）撮起牛粪，抛入江中。尚未打扫干净，天色渐亮，这才瞧见洒掉在舱板上的牛粪，金黄发亮，仔细辨认，竟是黄金！这便是本地盛传的“金牛过河”的故事。

金牛过河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到南岸“放牛坪”去了。“放牛坪”有一户农民，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儿子为财主放牛，每天天刚朦朦亮，便来到牛圈，把牛牵到对面草坪吃草，夜幕方归。那里人烟很少，四面全系树林，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中年汉子，牵了一头黄牛来此放牧。因为地点偏僻，以往只有一人放牛吃草，现在又来一人，日子稍久，两人熟悉了，不免闲谈起来。

放牛的青年述说他父亲原系这家财主的佃户，五年前病死，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全靠自己帮财主家放牛供养，可是从早到晚，忙碌一年，挣的工钱很少，难以维持一日三餐；他只好以粮食奉母，自己则待母亲吃过饭后，煮野菜充饥。中年人听了，很表同情，见这青年一边放牛，一边采集野

菜，便安慰他不必忧虑，自己可以帮助他解决每日柴薪所需。他说这条黄牛拉的粪，还晒干贮存着，正好可作柴禾。到了傍晚，青年把牛牵回东家牛圈后，便回家挑了担子，来到草坪上，跟随那中年人来到一处石崖之下，那里有一个洞穴，门口果然堆放了不少干牛粪。中年人一面把黄牛牵入洞内，一面吩咐他尽量多搬些回去。可是这青年并不贪多，随便撮了两大块，挑回家里，待仔细一看，哪里是什么干牛粪，竟是两大堆黄金。母子两人，高兴已极，再去寻那洞穴，已找不到了。此后再也不见那中年人来放牛。而那草坪由此便有“放牛坪”的名称了。

重庆的天财地宝，并不止一处；金紫门不过是其中一说，还有一个关于“金鸭”的故事。重庆陕西路下段，挨近过街楼，有一条巷子，名叫“金鸭巷”，是一处小巷道，巷内全系住家院落，金鸭便藏在那里。它深匿在砖墙内面，或伏居地下，勿论谁行经巷中，只要鼓掌，或张口长啸，那隐藏着的金鸭便会受惊回应，高叫起来；如停止呼叫拍掌，鸭声也就停止。因此许多好奇的人，常去巷内，故意喊叫拍手，以逗引金鸭为乐。尤其是一般孩子，更喜欢到那里去逗耍。只是金鸭是何模样，究竟藏在什么位置，则无人见过，也无人知悉。“金鸭巷”却由此得名。

这事给一个外国人知道了。他不知用什么方法，把金鸭藏匿的位置探查了出来，之后勾结地方豪绅，买通官府，竟把金鸭盗走，弄到外国去了。从此以后，无论怎样鼓掌呼叫，便再也听不到金鸭的回声了。

1947.5.10—19《重庆夜报》

东华观的由来^①

儒、释、道三大宗教，在清代巴渝各有本堂，除夫子池的文庙（儒），西里的华岩寺（释）而外，东华观便是道教玄门所归。东华观地址在城内四牌坊中段，范围很大，左起文华街，右迄玉带街，后面则以现在的大梁子^②南隅三、四牌坊^③为屏。这里原系一带高崖，形势险峻，下有十八洞，大小虽不一样，深浅各不相同，怪石嶙峋，藤葛满布，每到盛夏，凉爽异常，本地仕商，常在这里宴会；私家富户，前来避暑的就更多了。

东华观与南岸老君洞，江北弋阳观，同为道教本堂，分据渝北南三岸，成鼎足之势，但以东华观为最大，尤如释家的丛林。相传极盛时代，各方来此驻锡留参的道士，几乎有千人之多；观址殿堂观舍之外，后院花园，及东华十八洞，尚属客区游地。园门外面有小街三条，两列店家，都以制做出售道士戴用的软硬冠帽为业，直通较场演武厅，故名为“道冠井”，至今犹存，由此可见当年盛况。

有一种传说，东华观原名东华寺，乃明朝巴渝古刹之一，

本属释家所有，到了清朝，才为道人鲁一冲施法斗讼，改为道观。名称上只改了一个字，却有很大分别。但是观内仍有遗迹可寻，如正殿老君三清神龛，竟系盘坐莲台，而不是各跨青牛、狮、貔，这便是已往东华寺原有三尊佛像，因施术不及之故。至于道人鲁一冲斗讼，乃全因玄门在渝城缺乏本堂，虽南岸江北已有所据，但府制城区，不能或缺，其作用颇有与儒释两教非成鼎足之势不可。

鲁一冲于乾隆中季，由小河嘉陵江上游而来，是在华蓥山修炼的，亦有说自青城而来，于朝拜华蓥之后，顺江而下，特来渝城开创观基。他的外表，完全是一个游方道士模样。传说他最初从合川乘船南下，于磁器口上董家溪，便收伏了“飞缆子”（即今飞缆子滩）这一大精怪，第一次在巴渝显示道术。然后将“飞缆子”埋压在第一山长安寺韦陀座下深井中，并在南岸真武山山顶，竖立了一根铁桅杆，以为镇慑（铁桅杆至今尚在，一般呼为铁树），还在千厮门城墙边建了个“鸡毛土地”，相距不远，又在崖石上刻有“飞缆子”石像，这些都是他的遗迹。

鲁一冲在重庆的遗迹很多，四方街与一牌坊之间的“神仙口”，也是因他曾在该处显示法术而出名，且其事正与东华寺更名有关。原来鲁一冲到重庆之后，终日游荡于市，目的却在寻找适当的地址，以便开凿玄门的堂基。他每天就在东华寺山门口月台坝上卧宿。这里本是僧庙，小沙弥见有游方道士憩睡山门，竟加歧视，多次干涉，不准居留，鲁一冲置之不理，也不移往别处。后来寺内当家和尚，听信沙弥谗言，

竟用铅水洒泼，驱逐鲁一冲。这便导致东华寺被改作道观。此事发生后没有几天，在文华街一带，有道士高呼“卖雷”，人们以为游方野道，妖言惑众，不予理睬。过了数日，一天中午，却有个无知小孩，好奇心动，不知雷为何物，将所得买糖果的一文钱，向道人买一个“雷”。道人将小孩左掌画符令一道，命其紧握返家，方能开视。小孩行走间，正值巴县正堂何宗儒出衙，前队道锣响亮，小孩失惊不禁伸开手掌，只听轰然一声，惊雷震响，何知县立即下令追究，从小孩口中问出系道士所为，立即带返衙门询问。

这道士不是别人，正是鲁一冲。他供称东华观被和尚占据，改名东华寺，以致无所栖止，只得流落街头募化，恳求县大老爷作主。何宗儒信以为真，即出签饬差，将东华寺当家和尚拘到，当堂鞠审。和尚说，寺基乃前辈大和尚递传而来，根本不是占据玄门道观。双方各执一词，势不相让，无从判决。

何宗儒知县根据鲁一冲请求，次日到东华寺实地查勘，以明真象。和尚返寺后因日期迫促，只有一晚，连夜布置，整顿一新。次日知县率领仪仗差队前来，带同原被两告，入寺逐次勘视各处，所有一切，均系佛寺布置，惟大雄宝殿佛像三尊，竟已变为老子一气化三清，座下则为莲台，而非青牛、狮、獬，据说这便是鲁一冲使的“法术”。鲁一冲即据此禀称为道观铁证，并指控和尚来不及更换完善的地方。

东华寺僧，仅因此一点败讼，改寺为观，由释而道。东华观自此陆续扩大规模，修饰环境，成为玄门宗堂，山城避

暑胜地。至于三清莲台座，则仍按原样，并不改换，以志胜迹。

1947.6.14《重庆夜报》

注：

①本篇原题为“东华十八洞”。

②大梁子——今新华路。

③四牌坊——在储奇门与太平门之间。

神仙口的传说

渝市旧有街道，名神仙口者，在今林森路中段，与四方街相连接，右近四、三牌坊，后向文华街，直上即达中华路口；此处为三岔交汇，通衢要道，范围虽小，而街名甚著，即今另标新号，早经更异路名，倘一提及“神仙口”所在，莫不立指为某处也。

神仙口之名特彰，因其所在，乃渝城盛传逸事多端，妇孺均已悉闻，惟多里巷散谈，属于无稽。最堪笑者为“神仙口”，系“神仙狗”之误。相传昔有乞丐，卧倒该处，殊不明其从何而来。丐为一中年黑须之病人，左腿有脓疮，累累腐肉，淋淋血污，似已不能起行，倒卧历数日未去，既不向人求乞，惟长呼往来行人：“谁发慈悲善心，为我用舌吮舔疮口，则可就痊愈，功德无量。”终朝求告，见者尽皆深恶其秽，掩鼻合口急避之，连日不得人近视。

后忽有野犬，竟能不厌其恶，趋而为其吮舔血污。丐欣然起立，手抚犬头，频频称善，即偕升空，冉冉隐入云际，众始知实为仙人度市而来，殊无识之者，特此命名，提此为

街称也。

此一传说，非特无稽，乃属虚构讹拟，信口之言。实则神仙口之得名，本系风云怪异，确有奇迹发生于此。大凡地方故老，尚能道之。神仙者，指开辟三牌坊东华观、巴渝玄宗之鲁一冲也。时在清代中叶，鲁一冲既来渝城，即兴东华观之讼，与原来寺冲僧侣，互争其基，常浪游市街，因讼尚未直，仍属游方羽士之流。

当其浪游之时，竟显示神通，冀令官衙受理诉讼，使出“卖雷惊官之术”（见《东华观的由来》），东华观自此始入街名。

卖雷震彻之处，即文华街下转岔之口。此地本无街称，但异事已传遍遐迩，后因留记奇迹，兼以示崇仰鲁一冲之玄妙，遂以“神仙口”为名了。

“神仙口”原名“鱼市口”，此非专有定名，是一般人口头习惯，就其实际情况而称呼。此处本为下城菜市之一，同上城之大阳沟，中城之小什字（亦名菜什字），乃菜贩所集。菜市占地颇长，连带太平门、四方街，均在范围之内。

菜市内容，原按种类分别，荟集一处。近巴县衙门口一带，为南货摊店及猪羊牛肉架所在，居中之四方街，则为菜蔬一类，至于鱼鳖水族，则在文华街下口，街之两旁，全为摊贩盆钵罗列殆尽，“鱼市口”之名，遂由一般人习呼而成。

此处与巴县衙门相距不远，清代，冬至后期，处决人犯，即以该地为法场，免在辕门月台，又较近便，监斩守护，两得其利，及后竟成正式刑场，即以地当冲要，决囚于此，

寓与市共弃之意。清末宣统年间，平时重案立即处死，亦皆绑赶至此，直至民国成立，刑犯始另移别地。

“鱼市口”因作为刑场之故，遂不免有种种传说，但均为市井俚谈，类属无稽，或由偶然误会，而颇资发噱者，既有其言，不妨记之。

某次秋决，是日共斩囚犯十人之多，此在清朝却非常案，极为鲜有之事，先期已轰动全邑，致到日临场观看者，拥挤异常。旧例，因脑后蓄有发辮，待决之犯，于提堂撕衣上绑时，必将发辮由解差代为挽成一结，盘于头顶，颇似道士之顶结。

囚犯押至刑场，尚须用套勾长竿系其发结上提，俾引其颈伸直，以便刽子手奏刀。那知这一次，十囚斩首后，监斩者清点首级，竟得十一颗头，而身躯则仍十具摆列场次。初颇大惑，不明何以致此，后加以详查，始知刑场之旁，有一理发棚，当囚犯押至，一客正就坐理发，剃师正为之挽辮于顶成结，复又折转衣领，露出颈项，以便就洗，此客亦欲观望热闹，由棚内窗侧长伸颈项而出，适与列跪囚犯相距甚近；刽子手挨次奏刀，一一顺序而劈，至最末，尚有一人，与待决之囚，约略相似，未加细辨，亦未计算已斩人数，即引刀一挥而下，遂成此大错。

渝城之有电灯，始于一九一〇年“烛川电灯公司”成立以后，地址在太平门人和湾，除私家安装外，乃有街灯照明。在前则每至天晚，仅繁盛市街两列行号店铺门外，各悬四方或圆形招牌油灯一只，蓄油不多，二更左右，即告熄

灭，全街遂入一片黑暗。

至于小街僻径，大都是院落住宅，傍晚不久，即严扃门户，反无一丝光影，偶有热心公益者，照明一、二，指点街巷，亦属纸糊木框，机心萤火，行人略可辨清途径，至夜不过更后，俱告熄灭。除此之外，则有深夜售卖零食之小贩，挑担顶盘，走街穿巷，皆自备铁皮油壶，光亮较明。

“鱼市口”虽当通衢，复接闹市，但夜间亦仅有店铺号灯而已，即以地为刑场之故。每至更后，遂少行人，胆怯者，更不敢途经该处，是以冷落犹较其它街道为早。然而交通必由，仍有深夜来往于此者，究觉黑暗阴沉，凶戾尚在，倘非无所忌惧，方自泰然，否则心理虚怯，四顾茫然，终难免于即景生念，引发恐怖。

胆怯迷信之辈，每有忆测揣想之谈，指鱼市口杀气太重，邪地生异，以讹传讹，遂致越觉阴森。除白日开市，行人繁多，不虞意外，每至夜间，即成险境，皆要视为畏途，积久言传，竟有鬼叫怪号之闻，正头血颈之见者，杯弓蛇影，愈启异虑，无中生有之说，反引适逢凑巧之误。

有挑担售卖油余灰水耙者，夜过鱼市口，方停步歇肩，叫喊招徕，忽有人自黑处走近，未及走拢，先道“借光一用”！担上有油壶一盏照明，挑担者问：“借光何为？”答曰：“脑壳失落，寻找不得！”语方出口，挑担者抛下担子不顾，急奔逃跑。

须臾，偶有行人过此，见一黑影，手提粒火油壶，躬身街侧，蠕蠕而步，异之，问：“何所为？”则闻漫声回答：“我在寻

找失落的脑壳。”问者不俟细辨，闻语反奔几仆，惊吓至于不能出声。

久之，卖灰水粑者，未能舍其赖以维生之挑担，放胆趑趄返，遥见一人，正将油壶还插担架之上，且自取锅内灰水粑而食，详审之，确为人也。及走近诘其究竟，始知适才所谓“脑壳”，乃叶子烟管铜斗，俗叫烟杆脑壳，坠落于侧，借油壶照寻也。

1947.12.29—1948.1.4《重庆夜报》

注：

①此篇原题目为《关于神仙口》。

文峰塔由来

过去科举时代，各地对于文风的注重，是比任何事情都认真的，似乎本地方的上下人群尊荣显达，皆系于文风的盛衰。有的甚至为着竞争甲第，不惜互相攻讦诽谤，如苏浙两省，互相编造出“白蛇传”、“玉蜻蜓”的传奇故事来，藉以讽刺，便是一例。

重庆为四川首府，号称山明水秀，人文鼎盛之区。一个特殊人物的产生，总不免认为是地灵人杰之故，因此，风水的讲究，不仅民间崇信，地方官府，也负有特别的责任。

据说渝城早年官家叠出，甲不绝科第，乃是山形地利配合适宜，天然形势所使。如大河正面南岸屏山列堡，是“凤凰展翅”的状态，涂山为体，左右伸出二翼，远看一目了然，长江为玉带环腰；再有玄坛庙“字水”旁边的青狮，朝天门右上的白象，配合真武山下的“鱼跳龙门”……所以功名绵延，盛况荣显，超越其它各处。

清代嘉庆年间，一连三载，渝城竟无人名魁金榜。这不仅地方之耻，本地官府，也连带的光彩消失，可以蒙上教

说无方，循文无知的罪名。这样重大的关系。地方绅首士庶，以及府道县厅（江北厅），当然不敢忽视，便积极研究原因，考究内情，煞费周章，几经月日，方发现地方科考不兴，庙堂钟鼓不鸣者，乃“风水”之故也。

考究结果，认为是“风水龙脉”的关系。以前每年正月元旦，到南岸真武山赴香会的人们，由半山回龙桥直上南天门，而达山顶真武庙，这是唯一的道路。后来一位川东道台，据说为了还香愿布施功德，特地由回龙桥另修一条石板大道，直达山顶，从此便有了老路新路的区分。实际上对于行人，这两条路长短一样，仅仅新路略为平坦，交通往来，也没有多少便利不同。然而这一条新路，可把本地的“风水”破坏了，因为正好压断“凤凰”的左翼。

为了弥补颓势，挽救文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特地在南山巅上，修建七层高塔一座。早年城内东水门禹王庙侧，也有一座七层巨塔，上供魁星像，相传川东文宗，所寄于此。

自从南山顶上的高塔落成后，从此每天正午，日到中天便可瞧见南北二塔的倒影，映照到长江中；两个塔尖，却恰好结合在一起，再不象以往的空着一线缺缝了。这样，据说不但有补于“龙门”，有繁于“龙脉”，更还接续了气势，挽救了“风水”，因此，便命名为“文峰塔”了。

重庆南岸，原有二塔。一为龙门浩上的觉林寺塔；还有一座，却是用鹅卵石垒砌而成，高不过三尺，用泥浆糊砌在龙门浩河岸石梁上。这一座小塔，相传自清代开国，便已发现。不知何时何人，为何而造。据勘舆者观察，也是适应配合“风

水”而作，并非偶然造就。历年夏季，长江水涨，南岸傍河一带石梁，都遭淹没，那一座小塔，也同时沉入河内；可是到了秋末水退，石梁出现，小塔依然完好，又露了出来，经历多载，都是这样。自从文峰塔修成，南岸有了三塔，但是各处地势，互不相照，便流行“三塔不见面”的说法，就是指的这几处胜迹的状况。

1948.1.7—9《重庆夜报》

涂山氏故居

据经载：“禹娶于涂山氏，出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这是人们都知道的。至于涂山氏何许人也，故居哪里，却人言各异。关于涂山氏的出处，现今共有三处，谁都有遗迹可考。其一为河南省之涂山，其次山东境内也有三座涂山，此外在四川重庆的对河南岸亦有涂山。三处的人各执一词，认为真正的涂山氏故居，乃是本地，其他皆伪也。

倘若依据遗址古迹考究起来，在重庆对河南岸的一处，才是真正的涂山氏故居。这不是各本成见，历史故事，早经时迁境易，全仗现有的实际证据，为追溯的凭依。河南境内之涂山，仅一山堡而已，上面可资考究的，有涂山氏与夏禹的神祠一座，别无他迹；山东省的涂山，在泰山附近，也是一座小丘，除一碑记而外，神祠庙宇俱无。重庆的南岸之涂山，又名真武山。因为山上有真武庙，所供神像，以降魔镇怪的真正祖师为主，据说夏禹治水有功，即成为真武祖师，以镇压山灵诸般邪异为法力，其实此山即真正涂山氏的故居。山右石崖壁上有绝大“涂山”二字，为小扫把陈竹波所

书并亲自镌成，饰以白灰，每年由真武庙住持粉刷一次，直至于今。

现在所以稽考的遗迹，首为真武庙内之“禹碑”，真武祖师在大山门的首殿，禹碑就在殿里，高丈许，石质淡黑。上面所有镌刻文字，虽然大多数尚属完好，但系古篆，却又不墨规有本的篆法，似蝌蚪而非蝌蚪，似蚓文而非蚓文，那种古书法不容易认出来。过去曾经有不少专家，前去涉下以便研究，终未获得结果。十余年前，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旅行至此，也曾特地招工摄取副页甚多，以便携回考究，仍未听得公布下落，仅后来报上揭载该院已考出此碑确系上古遗留之物，但文字则不能注释。

其次则为半山回龙桥下，深渊西崖石崖上的刻字。这里是两山并峙，深数十丈，东面为登山的大道，可以影见江面的石崖为一高达数十丈的陡壁，岩天雄峻，刻字为一横额式，宽十丈开外，高达丈许，曰“涂山”。笔色苍劲，作正楷，一米可见，但未附年代书者名氏。早年曾由山上真武庙住持，涂以珠红颜色，俾岁首元旦，香会期间，可以引人触景生情，今则早已置之不理了。

这一石刻，据考究起来，也非数百年也。刻得虽然字迹伟大，但以琢取不易，且面积过大，故尚无人前往制作副本。至于原有的《巴县图志》，在民国十五年巴县文献委员会所重修的《巴县志》上（新志，计共廿本，附有图考），均无记载。

除掉以上两大遗迹更有“呱呱而泣”碑记，在山上真武

庙侧，由山门右下数十步塑立道旁。碑高约一丈，乃记夏禹出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涂山氏已经生子，抱着婴儿，立此瞻望父归夫还，儿呱呱，涂啜泣，想见当时凄切的情景。这一碑记，也是为涂山氏故居之一强证。

距离真武山十里，正当大河南岸弹子石码头与野猫溪江畔之间，有石梁由水内凸起，江水至此，积成浅滩，以春夏之交，洪水泛涨，正将石梁淹没时为最险，行船不慎，每致覆沉。此处地名“呼归石”，又称“夫归石”，相传亦系涂山氏遗迹。因夏禹远出治水，涂山氏常抱着她的婴儿，到此立于石上，遥望呼归，因而得名。

有人说“呼归石”乃“五贯石”之误，系古时奚燕山居此，因所生五子都获高中，联芳吉弟，后人为着纪念他的教子有道起见，故取此名。又作“五贯石”，寓五子攀丹折桂之意，这一种说法，尚无考究。

1949年3月2—3日《重庆夜报》

九 龙 滩

渝城大河上游十五里，有码头名“九龙铺”。抗战时期，开辟公路，并设过江车渡，随即又建设机场，交通日益方便，人口相应增加，商市热闹，茶馆酒店俱全，往昔亦有百十户人家，但不如现在这么繁盛。

“九龙铺”乃“九龙坡”的讹呼。起因于市集傍山面水，靠西与浮图关、马王场相通，山路交错，非铺而为坡。其实详究来由，九龙坡又因九龙滩而得名。九龙滩在靠河岸处，滩虽不大，水流异常湍急，因这里适当河曲，上承李家沱的来势，下值鹤皋岩的弯拐，遂成急滩，泡旋起伏，水花飞溅，远近十里以内，都可瞧见白浪滔滔。

“九龙滩”原本没有名称，其起源在三百余年前，即十六世纪末叶。其时正当明代万历年间，渝北南三岸，各有执事，分别管理，不过都属于重庆府所辖。南岸亦称南城，范围较江北岸小，地点在海棠溪与铜元局之间，即所谓南城坪（现呼为“南坪”）；坪甚高，为一天然城址，四面修有围垣雉堞；直到清人入关，占据中原，改变地舆制度，始废除南城，

拆去垣垛，所有东南两里，全部划入巴县辖区。至今南城坪尚可寻见旧时城垣遗基。

相传南城县宰刘永煌，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十六都人氏，崇敬佛道，迷信勘舆，任职数载，甚得民心。一天，忽然梦见奇异，觉自身正在衙门内堂的高阁上闲观瞭望，猛然瞧见由南门飞入红龙，共为九条，穿城而过，由东门飞出；南城坪仅有两门，东门外即近江岸，正与渝城南纪门对峙，为两地往来的水道要冲。刘知县大为骇怪，一惊而醒，心里颇感疑惑。此时天已近晓，窗外显鱼肚白色，他在床上辗转思忖，忽闻外面有锣鼓声传了进来，知系丧家抬灵送葬，不觉心里一动，便起身到高阁上去观看。

此阁甚高，又居城中心，站在其上，城外四周的景况，一览无余。刘知县看见正有一起送葬行列，由南门进来，经过市街，直向东门出去，灵柩后面，跟着披麻带孝的孝子，共计大小九人，自成一线，旗锣开道，吹打不停。

刘知县看了这情形，猛然想起夜间梦见的奇象，相互印证，不由心中更感诧异，立即私遣差役，随后跟着这一起送葬的，且看究竟如何，去到何处？不久，差役回报，九个孝子把灵柩送到河下，上船划向对岸浅滩前，候到辰刻时分，便共同抬起棺材，抛下水中去了，此外没见什么特殊现象。

原来死者亦谙熟勘舆之术。他竟然发现一路“龙脉风水”，集中南城斜对岸的浅滩，倘能葬于此地，可以获致九代帝王的幸运。可巧他正有九个儿子，便嘱咐九子于他死后，将灵柩用船运往滩上，等到辰刻，便有水花冲起，立即亲手抬起

棺材抛放水中，自会涌起河沙，将灵柩掩埋。九子谨遵父命，待其死后如法办理，却不料给当地县宰刘永煌知悉，据报之后，明白此中必定有特殊缘故，即亲自暗中前往视察。他也深研勘舆，精于此道，察看之后，心中便明瞭原来如此。

过去君主时代，地方官吏认为此类事件属于谋逆反叛，遂派差将九子捕杀，并抄斩满门；至于那幅阴地，则派石工断水埋炸，予以破坏，使“龙脉”中断。但此一段故事，已经传遍远近，于是这里遂起名为“九龙滩”，更由此滩而连带呼岸上的小村为“九龙坡”。

1947.5.3.《重庆晚报》

江北烈女亭

江北问津门外，靠左的城垣下，是一带石崖，高约数十丈，葛藤长垂，野树丛生。石崖下面，大江滚滚，凸起一带石梁。每当仲夏，两江泛涨，河水直达崖下，石梁成为一处凶滩。河下的人，根据石梁的形状，便将此处取名为“虾蟆口”。

洪水期间，江面宽阔，河水泛过石梁，虾蟆口亦被淹没。江水在石崖下形成漩水，俗称“回水沱”，所有两江上游漂浮来的东西，有一部分便顺流冲入沱内，旋转浮沉。因此，这里历来设有红船救生，善堂施有棺板，以收殓掩埋打捞起来的浮尸。

问津门前，有石级数百步，沿石崖凿成。在石级的中段，路旁有一座亭子，傍城墙而建。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临江的一面，是一排漆成红色的百叶窗。亭子的屋顶，接近城墙的雉堞，在清朝后期，这座亭子一度是很辉煌清洁的。江巴两县的士绅，有集会应酬，常在此亭中举行，成为江北城人们避暑纳凉、观赏江景的一处胜地。近几十年来，

不再进行维修，任其风雨侵蚀，亭子早已败坏淹没，仅存危柱残瓦，一片荒凉。

故事发生在清朝同治年间。嘉陵江上游的合州（现在的合川县），有处水码头叫“小沔溪”，距县城五十余里。这是渠河下游的一处热闹码头，凡是渠县、广安等地来往重庆、合州的船只，都要在此停靠；达县等地山区走川东的商贩，也在此打尖歇足。此处又是渠河岸米粮集散之地，故店铺较多，颇为出名。

码头上店铺林立，形成街道。其中有一家客店，叫“戴家老店”，主人系本地土著，世代居住于此，经营旅栈已多年，来往的商贩都很熟知，行人至此，遥见檐下高悬写有“未晚先投二十八，鸡鸣早看三十三”的白纸号灯，便知道是戴家鸡毛老店。

店主戴掌柜已过中年，妻子早亡，膝下只有两个女儿，年已十五六岁。这两个女孩自幼聪慧勤劳，性格幽静拘谨，尤其善于针黹刺绣，店中的缝补浆洗，全靠这姊妹二人料理。左邻右舍，尽皆羡慕戴掌柜有这一对勤快伶俐的女儿，亲戚朋友，无不夸奖这姊妹二人的能干贤淑。老父怜悯她们母亲早逝，膝下又无兄弟，不愿将女儿早嫁。虽说媒者纷纷登门，戴掌柜总觉不甚合意，故二女尚未字人。

戴家老店开业多年，久著信誉。戴掌柜为人忠厚诚笃，善于经营，小有积蓄。亲戚中有人见戴掌柜中年丧妻，尚未续娶，持家无人，便劝他续弦。戴掌柜对亡妻感情深厚，女儿又未出嫁，不愿续娶，但经不住亲友们一再劝说，后来便同

意了。

续娶的妇人姓江，因为生性刻薄，不敬公婆，被前夫休回娘家（封建时代，男尊女卑，丈夫认为妻子不贤，便以“休书”将女子退回娘家，尤如今日之离婚，但那时休退纯以男方意见为主）。这位江氏认为两个女儿系前妻所生，十分嫉恨，处处挑剔，经常借故无端责骂。姊妹俩自怨生母早死，活该命苦，虽然后母百般凌虐，仍是逆来顺受，含苦忍悲，更不敢向父亲诉说，只有在夜深人静，相抱而哭，自怨自艾而已。

戴掌柜虽也看到一些情形，但却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就是为二女早日择配。但江氏却以种种藉口，一再阻挠，并且终日在枕边向戴掌柜诉说二女对她不敬，极力搬弄是非。戴掌柜最初虽不以为然，但经不住江氏利口，枕边热话，日子一久，也就逐渐信以为真，父女感情，也逐渐淡薄起来。

旧时小家姑娘，极少读书识字的。戴氏姊妹，勤习女工，操作家务，虽然幼失怙恃，但从小思想纯朴、品行端庄，未致稍有失格。江氏对二女百般凌虐，仍嫌不够，尤其是二女逆来顺受，极力忍耐，更使她心头怀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势非拔掉这两颗眼中钉不可。便想了一条恶计，从中进谗，横加诬陷。

戴掌柜打算为两个女儿择婿，江氏便说，这两个女儿早就有失德的行为，出嫁后戴家要蒙受奇耻大羞。戴掌柜最初不信，但江氏成天絮絮叨叨，捏造事实，诬陷诽谤，久之，戴

掌柜也就信以为真，认为二女有失门风，不再考虑其终身大事了。

戴家经营旅店多年，小有积蓄，自然引起盗贼留意。一天夜晚，月黑风高，一个强盗翻墙进店，直入内室，正经过两女寝房门前，忽然店中的伙计惊觉，大声吆喝，群起追捉，强盗慌忙爬上二女闺房的屋顶，跳墙而逃。江氏便向戴掌柜进谗，说晚上进来的，并非强盗，是两人不贞，深夜幽会，故来人是二女闺房屋顶逃走。戴老板信以为然，便令两女跪于堂屋前，严加鞭挞，江氏则在一旁数落辱骂。两姊妹遭此无端冤枉，有口难辩，羞忿难忍。二人回到室内，呼喊自己的生母，相抱痛哭。

两姊妹相抱痛哭了一整天，无人递茶送饭，父亲听信后母谗言，怒气未消。两女知道生机已绝，倘若苟延残喘，后母必然加倍凌辱，岁月茫茫，今后的日子更不堪设想，不如追随亡母于地下，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

两女未读书，决心一死，自然无法留下遗书以明冤屈。次日夜晚，深宵人静，四野茫茫，风声萧萧，两姊妹来到江岸，解下脚带，合抱大石，互相捆住，紧紧拥抱，对着苍穹，低声叫道：“妈妈呀，女儿为您作伴来了！”说毕，跃入渠江。

其时正当洪水季节，渠江猛涨，在合川与嘉陵江相汇，浩浩荡荡，流入长江。此刻，江北问津门外虾蟆口的红船，昼夜巡逻，打捞流入沱内的什物。船上的人，忽见浮尸两具，紧靠一起，由汇川门方向往虾蟆口沱内漂来，便划船过去

打捞。捞起一看，竟是两具女尸，合抱一块巨石，布带紧束腰身，互相拴在一起。虽已早死，但面目尚好，衣着完备，不象被人推入江中，更不象失足溺水者。搜寻衣袋，也无遗书；无从查明姓氏里居，便暂时停放三洞桥桥下，以待次日用棺木收殓埋葬。

当时任江北理民府的保芝舫，则从所属乡镇视察粮情豫况返回府衙，由溉澜溪登船回江北，船在问津门靠岸后，改乘大轿进城。仪仗前呼后拥，轿班拾级而上。保芝舫坐在轿内，遥见桥下围了一大堆人，便令差人前往察看。回报是二具女尸，由上游漂来，无姓氏里居可稽。保芝舫便命停轿，舫保正前来询问，得悉情况后，认为其中定有缘由，便吩咐暂时棺殓，但不忙下葬，就地停厝在码头上，以待亲属认领。

随后，理民府又发出告示，详细列明二女面目特征，衣服穿著，遍贴江巴二县，两江上游，沿河场镇。先后过了三个月，仍不见有人前来认领。

匆匆过了半年，大家对此事也逐渐淡忘了。哪知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直赴江北衙门，自称姓戴，系由合州小沔溪前来投认二女尸者。

原来二女失踪后，其父戴掌柜激于情感，打算寻找。哪知江氏又趁机进谗，说二女因私情泄露，无法再事隐瞒，干脆不顾羞耻，随着相好的男子私奔了。戴掌柜也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必系私奔无疑，也就无心找寻二女下落了。转瞬过了数月，听见不少过路人谈论江北理民府的告示，不觉引起猜测，出于良知，才起程来渝。

保芝舫讯明来由，当即飭派差人带领戴掌柜到停厝的地方，启棺察看。时隔半年，尸体仍然完好未坏，面目如生。戴掌柜见了，悲恸万分，方才觉悟后妇的诬告陷害，而自己误信奸言，以致亲生骨肉含冤受屈，溺水惨死！但大错业已铸成，悔之已晚，沉痛之极，便具稟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痛斥自己的过失。

江北城乡人士至此方明白二女自溺的根由，对这两姊妹的贞烈十分赞佩，主张建祠立祀，给予表彰，以慰芳魂。保芝舫深表赞同，传谕街坊绅士，共同集资，就在虾蟆口石崖处，兴建建筑一座长方形亭舍，设立龕座，上供二女牌位，供人们凭吊，永享香烟，并亲自题写“烈女亭”扁额一块，高挂亭上。

戴掌柜遭受这一沉痛打击，伤心已极，特地购置上好棺槨，亲自护送，将两女遗体迁葬于三洞桥旁青草坝之阳。并等烈女亭修建竣工，目睹香火不绝，才返回合州。此时他已心灰意冷，对江氏非常憎恨，便择期召请亲友族人，并江氏娘家父母兄弟，详细述说二女致死经过，立具休书一封，当众交江氏父母。随即变卖所有产业，将全部资财，分赠贫苦亲友和乡里。然后又乘船东下，再次来到江北，延请江北城隍庙的和尚，就在烈女亭神龕牌位前，给他摩顶下发，剃度出家，以示决心忏悔。据说剃度后他乘船西上，前往嘉定，不知所终。

总 土 地

中华路南段，又名杨柳街。传说是明末张献忠率部入川，山城遭受兵燹，张路遇一妇女偕母携子逃难，感其孝心，嘱回家挂杨柳于门前，可保无虞。妇女返家后，告左邻右舍，于是都效法置杨柳于门前，一条街得以保全，后来便名“杨柳街”。抗战期间，杨柳街拓宽为公路，改名为“中华路”。

杨柳街中段，有一处小巷子，名叫“总土地”，巷中有一个土地祠。关于名称由来，有一段故事，且近乎神话。

原来，杨柳街有一户姓樊的人家，颇为富裕，正室之外，娶有一位姨太太。这年夏天，樊姨太太与几位亲友的太太小姐一道，在附近的东华观游乐宴会了一整天，返回时已是傍晚时分。她感到玩得有些疲倦了，便吩咐仆佣备水洗澡，顺手将头上的簪子、腕上的金镯取下，放于床头，随即解去衣裙，进卧室侧边一间屋去沐浴，并叫婢女映红进来侍候，给她擦背。

洗浴完毕，樊姨太太回到卧室，穿戴停当，便将适才放在床头的簪子金镯收拾进首饰箱内，哪知一清点，其它首饰均在，惟独少了一件金托针。这件托针，虽然不算顶值钱，

却是老爷去年上省的时候，在成都订制给她带回的纪念品。她在床头和踏板上寻了一遍，不见下落，只是洗澡这一会儿，肯定是被人偷去了。想到刚才取下饰物时，只有婢女一人留在屋内，便认定是映红所偷，喝令跪下认错，要她立即交出所偷的托针。

映红本是壁山县一户农家的孩子，不过十二三岁，因家庭贫寒，她的父母便拜托一个在重庆帮佣的本乡人，带到重庆，送给樊家当一名使女。樊姨太太见这孩子生得伶俐，便留在身边做为婢女，并取了个文雅吉利的名字，叫映红，至于她姓什么，谁也不知道了。映红跪在地上，声称没有看见什么金托针，更没有偷拿，樊姨太太哪里肯信，一阵鞭笞，映红只是啼哭求饶，不承认自己偷了托针。樊姨太太越更生气，口里说着：“这屋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别人进来过，不是你偷了还有谁？今天要不认，非打死你这贱骨头不可。”说罢，劈头盖脸，又是一阵鞭子，只打得映红脸上、手上青一块，红一块，啼哭求饶；但还是不承认偷了东西。这时佣人请樊姨太太吃夜饭，她方才暂时罢手，喝令映红跪在屋里。樊姨太太把映红打得这般样子，怒犹未消，非要拷打出口供，交出赃物不可，否则还要从重处责。映红也知道还有许多痛苦要领受的，感到畏惧，便于当天夜晚，乘人不注意，私自逃出；但又没有去处，便奔到附近巷内的土地庙中躲藏起来；因为这里既隐蔽，又黑暗，小孩子的心思，以为这是一个安全所在。

在夜深人静之后，大约深夜十一、二点钟，映红于睡梦

迷矇中，忽然被一阵声响惊觉了。她伏在土地庙角落里偷眼瞧看，只见有不少人在庙里集聚，都是衣冠整齐，面相和善的老头，分列在正中左右，好似在夹道等待欢迎谁。上首设着公案，似乎有人在案后高坐，穿着得十分豪华阔气，真是披金戴银一般，所有的人都挨次向他讲什么，似乎在禀报，但声音很低，听不清晰。后来，近处一人，拱手发言，映红因相距不远，较能听清。只见这人说：“本坊杨柳街樊宅，其妾昨日就浴，放置外间的赤金托针一只，被老鼠含走，拖到房内右壁箱架下面，竟诬婢女映红所偷，毒打过甚，此事……”映红听了这些话，更是吃惊，但却没有主意，不知如何是好。不久，又见所有人等，好象报事已毕，陆续退出庙去，一会天色便已大亮。忽闻一片人声嘈喳，原来昨夜映红逃走，后来樊宅便发觉了，派人各处寻找，此时寻到土地庙内，将映红寻到，立即扭回。

主人认为映红是畏罪逃跑，正准备狠狠毒打，映红惊骇万状，便说出昨夜在土地庙内所见所闻。最初，主人还不敢相信，随意用眼向右壁箱架下忖视，竟发现失去的赤金托针，果然在那里，这一下才证明了映红的冤枉，同时也感到这座土地神的“灵应”。这件事一传开，本地的士绅商家，便悟到这一处的土地，必定是重庆城内矮神之首，于是倡议捐款扩大庙基，并称这座土地庙为“总土地”，这一条巷道，也由此得名。

1947.6.19—20《重庆夜报》

较场坝土地

关于“较场坝的土地”一词，乃重庆流行的一句歇后语，意即“管得宽”的意思。但要详细解释起来，则不是三言两语谈得完的，其中更与地方习俗，过去的制度相联，但就此一语，已可见过去的民风之一般了。

中国长期封建落后，崇信神教。人们大多相信天堂地狱，赏善罚恶，笃信阴阳勘舆，认为“阴间与阳间是一般”，一个人始终是逃不出世界幽冥这两个大范围的；于是阳间有的东西，阴间也毫不二样。尤其是阴严于阳，一切违心悖理，作恶为非的勾当，可以瞒过阳世的人们，却难欺哄阴间执掌因果报应的鬼神。

阴间的所有神祀，一如阳世的官吏设置，大小有分，权柄各别。土地一职，是最普遍的亲民之神。名义划分，有所谓山林土地、家宅土地、衙司土地、街坊土地、乡镇土地、引生土地等等。至于较场坝的土地，则属于街坊土地，其职权尤如阳世的保甲长。

过去渝城内外，勿论大街小巷，都各有一座土地神祠，

为当地各居户所敬祀，界线井然。平时早晚焚香供奉，每逢朔望之期，以及三节时令，更要具备三牲酒礼，隆重的祭祀一次。土地神祠又称“戊巳宫”或“三品京堂”，通俗叫做土地庙。虽然不大，却在本街占据一个面积，有的在街头巷尾，有的则特辟一处空地建立。如无相当地址，则在过街口道或住户铺面之上建一个阁楼，依然金碧辉煌，神灯常照，早晚信香长燃。直到民国十一年间，重庆辟为商埠，先后翻修公路，沿路所有土地神龛，才陆续拆去。但偏僻街巷，则仍旧保留至今。

各处土地，也因环境不同，香火盛淡也就各异，外表和“灵应”也不尽同。重庆有所谓窍角土地、鸡毛土地、三层上地、金土地、红土地、总土地，甚至南岸东里三百梯的“吊膀子”土地（又名风流土地），界石乡的“单身汉”土地等等，都各有其特征、传说和渊源。

至于较场坝土地，自然也有特征，才能有此称号。原来重庆的较场，是清朝武试的考场。上下川东每年的学考，以及三年一届的府考，都在重庆举行。文试场在学院衙门（即今石灰市第三模范市场）。武试场占地较广，在城中心，较场的面积，东起关庙街，西迄走马街，南自十八梯，北止四贤巷，面积达千方丈以上；平时里面设有马号、箭道，供操练学习之用，演武厅即在附近；每岁春秋两次会操，也在此举行。

在考试开始之前，较场内要搭盖许多竹棚，夹成街道；为各种摊贩营业提供场所。考期一过，便又拆除，显出宽大

的广场，故有较场坝之称。

在考试期间，此地也和其它街道一样，并且还有夜市，非常热闹。这么大的面积，又临时搭盖许多棚户，不下几十条街道，却没有一座土地神祠；这里的商贩住户，并非不崇信土地，只因每年要拆迁，故不能建立固定的土地祠。在关庙街口，却有一个，这里是侵扰不到的，平时虽然冷落，但考期一到，临时棚户均来此祭祀，香火很盛，供奉优厚，于是便认为这个土地祠管辖整个较场，久之，便成为地方上的歇后语了。

1949.3.26—27《重庆晚报》

风 流 土 地

据依一般崇信神教者说来，土地虽是官小，但管理一方，乃亲民之神，事无巨细，皆须由彼而达上司。重庆有名“风流土地”者，则非固有其名，而是由于有一位土地神的行动，与众不同，作了一番风流妙事，直到如今，还有遗迹可寻；至于那件外事，则更为本地人所悉，并相互流传。

风流土地，在南岸鹿角场的三百梯，职务系“山岗土地”。因为那里是重庆通往綦江、南川、贵州以至云南的大路，在公路未修筑之前，每天来往的行商不少。这座土地祠，正当三百梯起点之处，立在大路右边。祠内本是两尊石像，即土地佬与土地婆二人。想不到这位有配偶的土地佬，竟演出了一场风流韵事。

清朝光绪中叶，这位土地，也许因事离开任所，顺着小河嘉陵江，到了合州所属的草街子。那里虽属北岸一处乡村，却是热闹的水码头。有一户有钱人家，生了一个姑娘，已经成年，尚未许配与人。姑娘的容貌长的不错。这位土地不知何故，竟看上了这位姑娘，居然同居起来，异常情好。最初，

他们的事，没有第三人知道，这位土地也具有他的法力，别人是不容易发现他的。谁知事情一久，姑娘竟一天天病弱起来，终至卧床不起，精神萎靡，这才引起了她父母的猜疑。

两老总觉得自己女儿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件。但做母亲的，却又十二分相信女儿不会有意外之事，因为朝夕在一起，从未单独外出。但既已有所迹象，不能再视而不问了。这是最秘密的事情，两老商量结果，便由当母亲的出面私下诘问女儿。

事情已到不能再隐讳的程度，姑娘不得不说出真实原因来。原来有一个男子，不知从何而来，每夜必到，天晓即去，历时已很久了。母亲推测这男子必系妖魔鬼怪之类，非予以收伏不能挽救女儿性命，便嘱咐待那男子再来时，必须问明其姓氏里居，只要把底细弄清，不愁没法制伏他。

后来，姑娘回复母亲，说那男子并非妖魔鬼怪，男子自称姓土，系巴县人氏，在渝城南岸三百梯坎下居住，家在大路之旁，尽人皆知。姑娘的父母听了此话，以为确有其人，既然木已成舟，莫若联姻为好，只要门当户对，不如成全其事，便动身来渝。到了三百梯，哪知问遍附近一带，并无姓土之人，三百梯上下左右，也没有住家人户，只在石梯起坎之处，有一座土地祠，内供神像夫妇二人。姑娘的父亲，想到那男子自言姓土，莫非就是这土地菩萨作怪？于是便具三牲供品，叩请土地不要再作祟于他的女儿，尤其恳求土地婆娑，大发雌威，不要让其夫在外多事。

说也奇怪，他自从祈祷以后，回转家乡，那男子竟从此绝迹了，姑娘的病也日益好转。更奇怪的是三百梯那两尊土地神像，本来是并排相坐，忽然土地婆的一只手，伸过来拉住土地佬的袍袖，大有不容其擅自走开之势。这座土地庙，至今仍在，确实与众不同，土地婆的手是拉着土地佬袍袖的哩。

1949.4.20—21《重庆夜报》

建文遗迹

距今三百年前的甲申岁，正是明末崇祯皇帝煤山上吊，满清入主中原，这乃是一般熟知的故事。

明朝末期，朝纲不振，上下贪婪奸诈，内乱频起，以致大势倾颓，宗社崩倒，导致其后清王朝统治三百余年。当时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无法挽回狂澜，只好一死以谢先祖。他哭祭祖庙，杀灭全家，以免蒙受耻辱。

崇祯皇帝在赴祭祖庙之前，先将宫中后妃赐死，并手刃其公主、太子。正当悲惨之际，也是危急之顷，忽然有一个宫中侍驾的阉宦，跪请将少太子留生，自愿舍命冒险，背负逃逸，俾给明室保留一脉香烟。崇祯皇帝在悲痛绝望之中，同意了他的请求，便将这个年仅十余岁的少太子交给那太监，趁着黑夜混乱之间，由后宫门背出逃命。这个少太子，就是“建文”。

关于这一段史实，竟没有后文的考证，虽有前人笔录札记，偶然涉及，也是不得其详，众说不一：或谓少太子后来终未逃出京城，死于乱军之中；或谓逃至外处，被闯王军队

俘获杀死，更有一说是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

可是巴县所属的南温泉后山，确有一山峰名“建文峰”。相传即明末崇祯皇帝的少太子，由那个太监背负逃出，辗转来到此地，感到天下大势已不可挽回，痛定之后，万念俱灰，便隐匿在这个山上，结茅为棚，以遮风雨，君臣二人，虔诚专行忏悔，后来老死山中，在山顶留下一个孤零的茅棚。为了纪念少太子，便取名为“建文峰”。此说如果属实，则可谓万想不到明室的最后一脉，却是远来西蜀，寄迹于巴渝南温泉的丛山之间。

47.5.6—7《重庆夜报》

冥王不在丰都

迷信说，人死都要到阴司，在生属官府管，死后还得受地狱阎罗管辖，世上有天子，阴间有冥王。世俗相传，丰都天子即阴间冥王，驻在丰都县平都山上。每年春季，各地前往朝山进香的，摩肩接踵，道途为塞，沿江停泊香会船达数十百艘，旌旗飘扬，香烟缭绕，由正月直至夏初，每年各方善男信女，耗费于此的银钱，更不知为数若干。

平都山在丰都县城东，高仅数百尺，山上庙宇林立，有如星罗棋布。天子殿在山顶，殿堂巍峨，内供冥王夫妇神像。而天子娘娘相传且为肉体真身，系渝城某商家的女子遭嫁者。故神龛之后，特辟一室，摆设床帐台几，都是天子娘娘的陪衾，如同寝室，因而见者更觉神异。

十余年前，记者曾游丰都平都山。见天子殿分前后两殿，前殿有判官皂隶排列左右，正中设置公案印绶台架，与清代官府制度相同，为冥王问事审案的场所；后殿狭小，仅有一木龛，上供天子菩萨夫妇，娘娘肉身即在此处，着凤冠霞帔，面部小而低垂，为凤冠旒冕所掩，仅有金色闪晃，不能细辨

眉目。当时陪导僧人在侧讲解介绍。记者问：“各殿为何不多开窗户，使光线明亮，便于参观？”答：“君不闻，神威赫赫之语乎？”记者知僧人误赫赫为黑黑，一笑置之。殿内光线晦暗，更增阴森之感。

一九二七年，北碚镇举行江、巴、璧、合四县联合运动会，记者代表重庆“商余互助社”携奖品前往参加，承卢作孚先生派员借马，独登缙云山游览（卢作孚当时任峡防局长、治理北碚，有模范镇之称，为该届运动会会长），至缙云寺，住持和尚往右侧一殿参观，殿上亦排列判官皂隶，左右廊下，塑阴司十殿赏善罚恶诸像，形状与丰都天子殿大致相同。殿中也设有公案印绶台架，神像则上坐靠椅，全部装金，身著彩绣袍服，据引导僧人介绍，此为丰都冥王天子。记者问：“冥王天子，在丰都天子殿上，何时到此地来了？”僧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冥王，不久之前，才由丰都来到重庆，自愿驻节在本寺的。”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据说，丰都冥王是在民国十二年癸亥岁，来到重庆的，而且是搭乘木船，直抵渝岸。当其在丰都江边上船时却变化为一中年人模样，与船户讲好价钱。这本是常有的事，丰渝之间的大帮船舟，除掉运载货物外，每每附带载客，名为“散载”，以区别于包船。

船到重庆，停泊朝天门沙嘴，正待搭客付资起岸，却久久不见那中年人走出棚舱外面来，船户只得进去关照招呼。哪知一看，那人竟变作一座神像，端坐舱内，虽为泥塑木雕，但头戴飞龙双翎金冠，身穿五彩锦绣龙袍，再一看袍上所绣

丝线字迹，有“丰都天子”之名，系善男信女所献，始知为平都山的冥王，来到了重庆。

这个奇怪消息，立即传播开去。早有南北两岸、江巴二县各处庙堂寺观的和尚道士、当家住持都一齐赶来，迎请这位菩萨到自己庙内殿上去享受香烟。因为都知道丰都冥王，最为善男信女所崇敬，倘能将冥王接去，便不愁香火不兴旺了。可是各方迎请太多，彼此争执不下，便共同议定，用卜卦来解决，由冥王菩萨自行决定去处。于是，大家分别验数先后，依决打卦。

所有本地庙堂寺院的那些当家住持，虽然恭敬叩求，热烈欢迎，但打的卦，不是阴卦，便是阳卦，可见冥王都不乐意。后来北碚缙云寺的住持和尚，也因闻讯来到这里，挨着前去叩卜，哪知一打便得个圣卦，于是方知冥王是要溯嘉陵江而上，看中了缙云山为驻节之地。寺中僧众，还包括北碚四周的善男信女，便选定黄道吉日，排列执事，敲锣打鼓，焚香捧供，由旗伞导行，盛大隆重的把冥王迎进寺内。从此，善男信女又多了一处可供忏悔祈求，朝拜冥王之所了。

尿 坑 菩 萨

本地民间有一句骂人的话：“尿坑罗汉”，意为见多识广。哪知正有这样一座菩萨，虽然并非罗汉，其位置却正在尿坑附近，只是这位菩萨享受香火之处在上海，而籍贯则为四川重庆罢了。

公元一九二三年，癸亥春二月，本人求学赴申，住在法租界大自鸣钟旁边的三鑫公寓内，这里距南市民国路很近。有次路过十六铺的洋行街，见斜对面一条小弄堂内，有很多年轻女子进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艳丽非常，后面跟了娘姨，提着香篮烛帛等物，一看便知是长三么二之类的堂班娼妓，有的还坐了雪亮的包车前来。再望弄堂内，则香烟缭绕，犹如庙堂香会一样。

当时并未十分注意。一九二六年丙寅之夏，二次去沪，住在五马路满庭芳的汇记兴客店。这是一家道地的四川店房，里面的熟人很多，同时上海也有不少同乡朋友，偶然谈到本乡“尿坑罗汉”这句骂人的话，有人便说，上海就有这样一位菩萨，在南市小桥头洋行街对面小巷内，而且菩萨还

是我们的贵同乡重庆人。

为好奇心所动，我便前去观看一番。那里巷道狭窄，弄堂也不深，就在南弄口，搭着一个棚子，下面堆着许多香蜡纸烛，好象有专人管理此事，前来敬香的信士，全系妓流，却并无神龛，也无塑像，就在棚子前的墙壁边，行礼致敬而去。据说，这里原为撒尿之处，后来将尿函填去，依然有人在此小便，故一般人就称这里所敬的为“尿函菩萨”。

这位菩萨，怎样又会有“尿”之名，而敬奉他的，又全属娼门中人，且菩萨还是四川籍，便更令人奇怪了。

经过多次访问，才从几个“老上海”处得到结果，虽故事略有出入，但大同小异，加以整理，大体弄清了这位西蜀贵同乡在万里之外的十里洋场落户的经过。

尿函菩萨的姓名已不可考，时间是在清光绪初年，原籍为四川重庆人氏，是一位贩运麻布的商贾。最初只在本省荣隆二昌至重庆间往来，大获盈利，资本既厚，便打算扩大经营，到上海去做生意。哪知第一次贩运麻布到了上海，就大蚀其本，无法回转故乡，后来竟困死异地，作了他乡孤魂。

这位麻布商人，是想大做买卖的，又系初次去开辟码头，所以尽其所有，购足货物，满载东下。那时交通不象现在这么便利，由渝至宜昌系乘木船，到了宜昌再改乘汽轮赴申。途中几次转口，方到达上海。一面出售货物，一面也要“白相白相”这华洋胜地。初到上海，耳闻目睹，事事感到新奇，眼花缭乱，心动神摇。当时的上海书寓盛行，每当华灯初上，俏人纷出，歌馆酒楼，声色荡漾。这位商人，居然也想

到长三么二的堂班里去，开怀一番。哪知一经问津，便深堕色界之中，不能自拔。好在这些地方，完全注意金钱，只要有金钞同行，包管快活无疆。他便将所有资财，孤注一掷，尽情花用，以博乐趣。哪知有限的金钱，填不满这无底之洞，后来终于床头金尽，闹得嫖士无色。妓院鸨儿爱钞，当然不会同情无钱之客，便下了逐客令。这位商人原也阔绰过来的，一旦处于困境，不但形色狼狈，而且恶病染身，又系足踏生地，举目无亲，告苦无门，沦为乞丐，后来倒卧街头，无人过问，终至冻饿而死。

他死的地方，就是后来一般娼妓敬香之所。至于这般青楼莺燕，为什么要去朝拜这位尿幽菩萨，却是为着所谓“烧路头”，希望自己生意兴隆，能够多遇上几个这位麻布商一类的人物啊！

47.8.8—9《重庆夜报》

火神庙故事

水火两神，为迷信者所崇敬，不但民间信奉，历代官府也很提倡。地方官求神祈雨、设坛消灾的故事，各种小说、历史中多有记载，这自然有久远的历史根源。随着文化普及，科学发达，信奉者便越来越少。现在的重庆，已有消防车队的设置，各街坊也有义勇消防队，备有“水龙”。但在往昔，则沿袭迷信传说。各坊、厢例有“斋会”，定期设坛祭祀，祈免水火两灾；而火神庙与水府宫，几乎各县城甚至市镇都有建立。重庆火神庙，原在四牌坊近玉带街处，即警察三分局所在地，为一宏大的庙宇，且当正街，举行会典，较其他各处为盛。

火神庙于三十年代末期拆去。这所神庙修建得很辉煌，有戏台看楼，正殿中供有火神塑像，高一丈多，彩袍金身，红脸紫须，形象异常威严凶狠；神龛四周围以木栅，朱漆贴金，镌刻有供奉信士的名字，神像光彩非常，从未蒙尘；左右两厢列有神记及各种执事，庙内当家僧人常年供奉香火，按期举行祭典，十分兴旺。

关于火神庙的故事传述极多，据说凡是各地发生火灾，都是属于火神掌管；凡是被火烧的，都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神定灾决；失火这家的祖先，还得到火神处投案，经三代画押之后，方能起火。因此，人们越传越神奇，说每当发生火灾的前几天夜间，便会听到火神殿上脚步声杂沓，人语哄噪。数十年前，正当清光绪中叶，重庆城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由下城烧到上城，东起陕西街双火墙，西迄大梁子，南自县庙街，北止小什字，计受灾户口万余，包括川东道台衙门、第一山长安寺等，都被焚烧，乃是百年未遇的大火。传说火灾发生前几天，有一道士，手捧钵盂，内贮清水，在这几条街上，喃喃自语的念着：“扳、扳、扳，陕西到长安，双点大蜡烛，红遍一座山……”当时人们自然不知语中奥妙，及至火灾出现以后，才印证道士所说的话，乃是预知其事，促即迁移。“陕西到长安”，指焚烧范围；“双点大蜡烛”，系指川东道台衙门月台坝上，一对高大旗杆着火的现象；“红遍一座山”，说的长安寺第一山，正居火灾中心高处，四面焚烧的景象。每句都有所指。可是明白过来，已经是火灾后，道士也无影无踪了。

这一场大火焚烧的区域，都是重庆城繁盛的商业区，不但受灾户数多，损失也大。事后，火神庙香供和尚便向外传述，事前已有兆象，接连多夜，听见大殿上非常嘈杂，好似有不少人进出；喧闹声直到天亮。——原来这就是受灾户的三代祖先前往画押，办理手续去了。

每当发生火警，当火势正大之际，火神庙的和尚，便立

即鸣钟击鼓，焚香秉烛，顶礼叩拜，祈请火神归位，意在要求饶免；同时还要为龛上供奉的泥塑神像扬扇招风，用巾拂面。礼仪周到，一般崇信的人，认定决不可以马虎草率，以渎神威。

清代，火神每年要出行一次，游经全城各大街闹市；由各商业帮会集资承办，耗费巨大，称为“出亭子”，以消弭火灾，声势盛大。虽然府县城隍菩萨也要“出亭子”，但不及火神热闹。凡是火神舆驾经过之处，沿街两边，不论住家或商号铺面，家家户户都要焚香膜拜，叩求火神庇护。

过去遇着发生大火猖狂不能扑灭时，巴县知县大人便要率领全部衙司差役，亲临火场指挥施救。倘若仍然不能制止火势，或火势迫近知县衙门，县大老爷便要將顶戴袍服脱下，投入火中烧掉，表示“本县已被焚烧”。这与发生大水灾时，知县大人在江岸设立公案，命令差役打“水板子”一样的意思。

对于一般普通人家，遇着邻居失火，如果火势迫近，也有一种迷信的法子，此法也系由火神庙传出。就是将清水一大碗，摆在自家神龛上面，用竹筷一双，交叉作十字形，放在碗上，便可避免火攻，不致遭灾；这与每一次火灾后，“火头”照例要延请道士，为本坊厢“打火醮”时，前往各家各户，消除火星，门外放置水盆一只，内放铜钱十枚，上置铁夹一具，道理相同。

这些迷信愚昧行为，今日看来，诚属荒唐可笑，但在闭关自守，科学不发达的当时，未尝不是人人皆奉为理所当然呢。

渝城三山

重庆为古州，因创制而称“渝”，立县而名“巴”。至于“山城”之号，乃是抗战时期，外省来渝人口激增，见惯江南、华北平原的外乡人，鉴于重庆依山筑城的形势，取了这个名称，并非以往固有的称呼。

数百年来，随着时代变迁，重庆的城市范围，甚至地形外貌，都有极大的变化。本地志册，虽记载详明，但因时代久远，累经重修，街道增删，已难复旧录。如清代三百年中，曾四次改革制印。自清末同治、道光至民国三十年间，亦曾两易其事，前者为《巴县图志》应世。民国二十二年，重庆便设立“巴县文艺委员会”，从事改篇，力趋新制，但仍循旧范，名曰《巴县志》，内容充实，篇幅增多。遗憾的是古旧典故，未能尽收，例如古代渝城的“三山”，即本文所述者，系重庆固有的形胜，巴县舆史的掌故，对于研究渝城地形变迁，风土故实，规划城市建设，不无参考价值，县志却未记其概略。

“三山”者，为重庆城内的高峰地梁，现在虽早已隐

没不见，或名灭不彰，但形势仍然存在，本地土著，或留心沿革者，尚能忆及。

“三山”是三处凸起的堡峦，鼎峙城内，各有其名，即“第一山”、“太阳山”和“金碧山”，都在城之中部，山上可放眼大江南北，遥望附廓乡镇，百里之内，尽收眼底。这当然是旧时的情况，不能以今日相比。

“第一山”即今日的长安寺。此处为城东最高处，与附近玄天宫相峙而立（玄天宫在今小什字标准钟侧，曾由基督教会购去，改建为福音堂，抗战时期，转让与中央信託局），往昔是一山峦，故名；明万历之前，尚无房舍，后修建佛寺，始有僧侣驻锡其间，至清初，庙宇扩大，正名“长安寺”，山门外彩塑四大天王石像，威武庄严，金碧辉煌，即所谓魔家四将。

明亡，清王朝建立，当时渝城号称“四大家”者，皆属权贵豪门，各占地面，逸养悠乐，广置田园，争显斗富，龙王庙侧的治平寺，亦被赁赁淘汰，变菩萨堂宇为园林。寺中原有铜佛两尊，便被移往长安寺内，与该寺原有的一尊配齐，长安寺便益增兴旺，善男信女，朝拜者络绎于途，成为古渝城香火丛林之首。

自清乾隆至民国初年，先后不到二百年，长安寺三次被焚，幸铜佛及四大天王保存完好，依然如故，远近信士，尽力合谋筹备，始克恢复。

长安寺建于明朝，其正门入口处，有一高大牌楼，系泥石建筑，形式庄严，气象宏大，精工雕琢，良匠细镂，中横

牌额“第一山”三字，苍劲潇洒，字如斗大，相传系苏东坡真迹，故为该寺名胜之一，凡游览其地者，莫不留步瞻赏。后遭第一次焚烧，此牌楼亦被焚毁，及后两次重建山门牌楼，仍仿旧样，但总不如以前壮丽，“第一山”三字，亦照旧书，然而虽出自能手，究竟不如东坡亲笔。巴渝民俗，每年正月初一日起，要到南岸涂山真武庙朝拜祈祷，顺道赴黄桷垭老君洞进香，非常热闹，多年来已成习惯。但在早年，则以第一山长安寺为朝拜之所，兴旺景象，不亚于今日朝拜南岸真武庙。

一般香客，于登第一山后，礼佛既毕，即顺道经由滴水岩（即现在兴隆巷）而下，至古西湖池（即筷子街。早年是一大沼泽，阔数十亩，可以游船荡舟，后淤积填平，改建为药王庙。民国十六年，复修作民生女校，曾设宪兵训练所于内，后变为民房），乘舟到罗汉寺烧香，礼佛完竣，方尽情游乐。

“太阳山”在今民生路、大同路之间，位于城西部，原为一小山堡。清代初叶，渝城因遭战乱，人烟稀疏，至乾隆、嘉庆时代，渐告恢复；但商业市街仍在下城一带，所有官府衙司，也均集于下城。至于后伺坡以上，即今中央公园^①以上地面，全为旷野丛林，间有庙宇祠堂散立各处。

渝城位居扬子、嘉陵两江之间，俗称大小河。清晨，日出南山，顺扬子江环绕城区，夕照嘉陵江北。每当午后太阳偏西，一轮红日，冉冉隐没于山堡之后，远望彩霞频射，金光万道，与绿树青山，掩映成趣，益增无穷自然美景，此处

之小山堡，即太阳山。最初丛树小丘，原无名称，命名由来，即因此而起，切合实际。太阳山左侧，初系明代显宦简天官府第，其间庭园广大，布置精雅。后以时势推移，权沦乌有，乃由地方政府，禀明朝廷，改修为先圣庙宇，前贤祠堂，建殿廊，立宏门，辟放生池，修宫垣，长设祭典，此即渝城夫子池文庙之始也。

文庙廊庑之右，即太阳山所在，当最初建庙，曾以围墙隔开庙后，范成数十亩之园林，太阳山亦被括入，虽未设置亭轩，而游人登临，瞻近瞰远，堪称惬意。每逢会期，人群拥挤，争往游览，为全园好的所在。俯瞰左侧，可以遥望嘉陵如带，帆影舟楫，远山近水，不啻图画，江北岸百里之内，尽收眼底了。

后来渝城日渐繁荣，户口增多，此处便成通衢。夫子池周围，陆续改建，如文庙左边，后辟为教育局及巴县图书馆，“魁星楼”往昔亦在文庙范围，以后为拆建街道；夫子池周围俱变为市街，民房鳞次栉比，遂为街道隔开，俨似单独建成；放生池原有矮垣围护，亦渐拆毁。文庙面积便日形缩小了。

文庙后部的园林，亦顺应用需，辟出街巷。如今临江路靠西一带，在未建路前，全系住宅区域，屋舍多为巨大庭院，内多古树浓荫，小园修竹，皆为文庙原有种植，未加拔除，居住者便利用陪衬，以资观赏。

四川创立女子师范，第一女校，设于成都；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则设于重庆。校址勘就公地，须环境清幽，适宜教读，因在夫子池右侧，以接近文庙，寓圣诲贤能意义。尤

以该处地在上城，远距闹市，兼具丛林丘沼之盛，遥衬山水江河之景，诚属至当之区也。于是便拨划大幅偏右园林，因地制宜，建修屋舍。校之极右，与太阳山间隔咫尺，早晚学生课前休息，可以登临瞭望，从此遂范作该校所有，外人不得进入其间。

光绪末叶，维新教育，对于女学，亦所注重，尤贵提倡妇女生活自立，打消依赖习惯。国内各地，先后创兴各种有关妇女职业训练之组织。重庆士绅，于是合议设立巴县女子职业学校，虽属县立，尤有企冀于先进女学之林。因就夫子池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右侧为址，取性质相近，互相为助之义，兼亦利其环境之适宜也，故定太阳山为基地，建修校舍，招生开课，此后，太阳山遂又一变其原有之丘林面目了。

民国十七年，女职校停办，该处即并入省立二女师，地基亦范入其中，另一部分则改建民房，先后几经更易，物换星移，沧桑叠变，太阳山尤非往常模样，惟地势高茁，凸然有别，至今虽难稽其旧，而形式仍依稀可辨。

重庆环山带水，两岸对峙，城区名胜尤多，旧有巴渝十二景之称。其中一景，叫“金碧流丹”，即指金碧山的天然美景而言。金碧山在城内大梁子偏左，与第一山长安寺相距咫尺，即今中央公园^①左上所在。此处地势高茁，正对南岸。早年渝城市况尚未臻于繁荣，上下城情况各殊。下城烟户密集，上城则属郊野，除少数巨家别院，僧道寺观散立，均为田土丛林。金碧山名之由来，是基于这山在上下城分界处，高岩陡坡，一派乡村景色，顺山势有石阶数百级，为上下行人捷

径。半坡上曾有人户，搭有过道棚架，摆设茶水零食小摊，并置条椅小凳，便利行人休息；这户人姓肖，为此土著，故一般称呼这个地方为“肖家凉亭”，积久便为地名，沿袭至今了。

沿石级至最高点，即达金碧山。高崖当前，势极峻峭，岩石色赤，即红砂石，此种石质重庆城内并不多见。上到山顶，四望尽系郊野，田土园林，间互纵横，范出大溪涧，引道流水，大梁子等地顺势下泻，向南成渠，偏东之处，蜿蜒流向金碧山。早年，该地又名“后寺坡”，因为适当长安寺背后，沿习既久，今尚留名；这里即正当流水所在（如今日大阳沟、回水沟，瞿家沟、香水桥、响水桥，过去都是往城内溪涧流水经过之处）。

金碧山崖石高矗，流水至此，顿遭抑阻，成为瀑布，自上而下；又因石岩壁立，瀑布散布较宽，衬以红砂石质，极为壮观。每日早晨日出，瀑布被阳光照射，金赤焕彩，光辉闪耀，崖壁赤紫，流水泛桃花之色。月至中旬，玉兔东升，银光洒遍山城，映射山崖瀑布，更觉异彩焕发。每逢早晚，便有不少人前往参观，一览胜景。到了后来，城市渐趋繁荣，大梁子一带陆续成为市街，建修屋舍，金碧山首当其冲，流水由混浊而枯竭，垃圾成堆，便逐渐失去原状。现在欲观旧貌，已不复可寻了。

1948年5月17日—26日《重庆夜报》

注：

①中央公园——即今之人民公园。

九开八闭之故

自从民国十五年以后，重庆开始修筑公路，所有城门，相继拆除，至今尚还存在的，只有“东水”、“通远”二门。在民国二十七、八年间，又新开辟了“望龙”、“嘉陵”二门，现在计算起来，共有十一门。但自明季末叶，以迄清代中世，重庆的城门，共是十七座。

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城门呢？这在历来的制度上，各有其封建的原因和作用，不过内中有八门，却是水门，现在都早经封禁，通筑城墙了；有的尚有陈迹可寻，遗名可稽。这八道水门，是间隔在至今存在的九门附近，其名称为梅郭、望龙、人和、凤凰、金汤、定远、洪崖、嘉陵。

先年开辟这八道水门的原因，除特殊作用之外，又是备为城内取水之用的通道。试看今日各码头的旁边，都另外有水码头，以前挑水，是由各道水门进出的，直至清代同治初年，八道水门始因故封禁，所有行人，俱由保留的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通远、临江、千厮等九门进出。因此，本地便流传“开九门，闭八门，九八一十七条门”

之说便清楚了。

为什么要封闭那八道水门呢？原来当时着重“风水”之论。因城内火灾接连发生，官府与地方士绅名宿，认为水门洞开，不能克制火星，所以将八道水门封闭；同时又在城内，分东南西北中五处方位，开辟莲花池、西湖池、熄火池、浩池、夫子池五沼；并就城西通远门附近，修建七座石质太平池，取名“七星”。后以此处地势较高，便叫做七星岗，以符合北斗七星之义。至于封闭的八道水门，后来有几处为着便利，便用作城内下水沟的通道了。

原来开辟的十七道门，是顺应风水，讲求生克的关系。所谓正式通出入的九门，乃是“九宫”，用作水道的八门，乃是“八封”，再合九宫八封之象，以示“金城汤池”的含意。而且各门的方位，也是各就对向位置，划分出水旱码头。各门命名，也是或按“五行”，或就地势，或寓形势，或本实况，细加考究而定，由此可想见当初时代风尚的情况了。

1948.1.5—6《重庆夜报》

何为“三将军”

大凡居留渝城较久者，都听说过“三将军”这一名称。所谓“三将军”乃是指的三数，并非仅有一名，至于何为“三将军”，相信人们皆会认定这指的必系三员武将。也许在涂山字水间，曾经遗有不朽的战功，所以才能名昭千古，传播至今。

其实“三将军”并非三员勇武的大将，而且根本就不属于人类，乃是三尊巨大铁铤的称号。在过去时代，兵器还在萌芽之际，虽今日看来乃毫无可用者，但在以往，却曾受过非常的重视，奏了特殊的战功，所以人们为表示崇敬起见，便也称做将军，盖取物与人同之义。

三将军系明崇祯末季，义军张献忠造反时，官府为防堵义军攻城而铸成的兵器。因重庆地势处两江交汇，南北二岸左右对峙，防堵的力量，也必须配合渝北南三岸方面有济，故特铸成巨铤三尊，以备各据一埠。在当时，官兵视此庞然大物，认其具有无穷的威力，流寇祸乱，当不足为虑也，所以别上尊号，直呼将军。另外分特排行，各按行次守护要隘，这是

以将军的威望力能，比拟此不属动物的三尊铁统。

三位将军的外形伟像和内具机能，虽然一模一样，毫无分别，可是以据守的地方重要与否，却分出了各自的名份。大将军系镇守渝城重庆府，二将军镇守江北，三将军镇守南岸，界线划分得异常明楚。三将军的尊容，见过的人很多，渝城千厮门在城坝上，即有名的“炮台街”者，就是当年大将军的汛地。炮台为石条砌成，周围圆径约十丈，高八尺许，大将军即据炮台上，雄视着长江下游，颇有“休大胆闯进前来”之慨。

其威力究有多大，在战斗中起过什么作用，无以稽考，但本地有一句话叫做“炮打人头山，子落长寿县”，就是形容这种炮的射击情况；“人头山”在溉澜溪下首，距城不到十里。为什么炮子会落到百里以外的长寿县去了呢？原来，人头山附近，有一幅地面，不属江巴二县管辖，而归长寿县所有，故此“子落长寿县”了。（此段摘自《炮打人头山》一文）

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间，洪崖坊一带改筑马路，炮台方告拆去；就其地修建了一座公馆。大将军的威力已成过去，遂移其遗体置放于附近的城墙垣下，所以有不少人都曾瞻仰过它的威仪。

至于二将军的镇守之地，原系江北；但是三位将军的出生之所，都在重庆方面。二将军要赴它的汛区，自然需要渡过大江，于是便用舟由朝天门码头装运过渡；也许是船小载重的关系，方至大小两江夹码水上，这里还是江北，不幸竟

致沉没，而且深坠水底，连打捞也没有救起，以致二将军始终未能抵达它的驻所。

关于二将军沉没水中，本地便流行着两种传说，都不免是后来人们的附会之谈。一说当时二将军已为神物，故能幻化形态，它知道自己的体肥庞重，运向对河北岸，颇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为了珍惜人力，减少众累，遂变化成一个寻常的人到朝天门外乘船过江；船夫是一个老者，二将军又是个人包船，老船夫认为只有一个乘客，并费不了多少气力就可摇渡过河，所以未曾加叫一个推橈的人来帮助；哪知船离开码头，便觉异常吃重，似乎满载一般；老船夫最初尚不以为意，及后来越来越觉费力，大有推运不胜之势。本来二将军是铁般巨重的肥体，一只细小的渡船，一个老弱船夫，如何能够胜任，把它顺利的运送过去呢？使了绝大的气力，好容易船到江心了，这才仅完成一半的水程，老船夫不禁向着二将军道出他心里的苦闷说：“你真是铁一样的重啊。”这句话虽然出之无意，可是糟了，“仙机不容泄漏”，二将军的真相被人识破，遂无法再隐，立即显化出了本来形状，骇然一尊巨甬，小船当然不胜装载，以致立告沉没。

在扬子、嘉陵两江交汇的夹码水下，却传有神庙一座，名叫“金竹寺”，朝天门码头的石级下完，便有一高大石拱桥通达寺外山门口的月台，二将军沉没水中，却坠落在石拱桥上面。据说是某一年江水枯退，渝北两岸有如相隔一条濠沟似的，有人发现江中心凸出一物，色黑放光，荡漾于夹码水面，因此人们方始知巴二将军坠落在石拱桥上的传说不错。

三将军的汛区本在南岸，坐镇的地点，系今大佛寺前名称“石龙过江”的上首。此处适当下游，正对水道的来路，真算一将当关万军莫入的要隘。至于三将军的下落，则传说早已成神物，隐去无踪了。其能成神的原因，系因它所在之处，与大佛寺相距咫尺，这是巴渝丛林之一，寺内每逢朔望两期，有讲经说佛的盛典，它参与其间，虔心佛法，皈依三宝，因此甚得超度，居然依神隐去，真是莫大的造化，这也不过是地方的传说如。此更有一种神乎其说的，据言三将军是隐在大佛寺后面花园丛林，曾经有游人偶然走到后面，忽然瞧见一尊巨大铁铤，昂然竹树林中；那人连忙呼叫同伴观看，不料一转眼间，顿失所在，方才恍然大悟，乃是三将军的法身，有缘者可能在无意间获瞻仰的机会，否则那就休想看见它的威仪。

三位将军的镇地，当然都是要隘。二将军雄据北岸；三将军所在的大佛寺，更属胜迹名区，这里正对着人头山右下为“铜锣峡”，左上侧“呼归石”，形式配合得当，非特兵家认为险要之区，一般勘舆家也称其为风水龙脉归宗之处。自明清以来，很有不少研究地形的人，曾历越很遥远的途程，饱尝辛苦，翻山越岭，顺着山势水径，先后追寻到此。

曾有勘舆学者，从贵州顺着龙脉，步行来到重庆，真不知费了几许跋涉的辛苦，经历过若干风雨的打击，他忍耐着，非穷其究竟不可。后来终于找到了龙脉归宗之地，正在渝城南岸大佛寺。按照形胜看来，乃是一幅阴地，人有葬此者，其后嗣荣显，真有难以限量之概。

然而这位眼高学富的勘舆者，自己知道无福葬在这里，他特地把费掉一番辛苦得来的结果，留示给后人。他在大佛寺前题的字迹，昭告人们，指明来由，其辞为七言韵话，并详述地势形胜曰：“真武山前一脉来，此地流来在东台，铜锣峡内旋旗绕，人头山作点将台，呼归石上青烟冒，大佛寺前挂玉牌，有人葬得此幅地，一代一个状元来。”

自从这几句题词揭示出来以后，引得远近的阴阳先生，都来追寻探视。有的富贵人家，则不惜重金延聘勘舆之流，前来寻觅所在，以便葬其先人，发达其身。后来竟被本城一家富绅请的一位地理学专家确定了所在。这家富绅是用来安葬母亲的，便遵照指示，飭工开井落葬，哪知正是此刻，忽有小鸟飞来井旁树枝上叫个不止，其声“吸吸呢”；这位地理学专家神经过敏，他听来俨然为“不是地”，心里不免起了动摇，自己怀疑容之未妥。即忙说：“此地尚待斟酌，改期再为下葬。”富绅家便遵嘱暂缓安埋，又复详细考察，确认地实地址，并无差错，乃决定再择期下葬。不意临期前往，该地已经被入埋占了，即向寺内叩问葬者何寓？据答为江北胡姓的老母，这样恍然悟到，目前小鸟叫声系“胡比地”，足证“福人葬福地”之说，并非虚语。

三将军的镇地，所以相在大佛寺前，可见不是随便的事。兵家动止，首重地利，古今中外皆然。直到现在，这里仍属巴渝胜迹之一，给人们以掌故的追念，岂是偶然的么？

1946年《重庆掌故》

三铜佛由来

重庆城内第一山长安寺，在一九三九年被日本飞机炸毁前，寺内正殿中龕供有铜佛立像三尊，各高一丈开外，神态庄严慈祥。居中系释迦牟尼，左右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这三尊巨大的铜佛，不但香火兴隆，而且名著遐迩。长安寺为本城远近皆知的庙宇，进门四座高大的天王石雕像，称为四大天王（即魔家四将，据封神演义记载，系殷商纣王镇守青龙关的弟兄四人，名魔礼青，魔礼海，魔礼红，魔礼寿）。长安寺的名声，与三尊铜佛有很大的关系。

长安寺为巴渝古刹，清初已颇著香火。每年春正元旦，地方人士，登第一山朝拜祈祷，情形有些象后来上南岸真武山老君洞那样的盛况。正殿供的铜佛，只有一尊，即正中的释迦牟尼像，考其塑造年代，乃明朝万历年间，有文字凸起于背后中部，至于左右两尊铜佛，原不是长安寺所有，而是

治平寺正殿所供奉的。治平寺在龙王庙左侧，即现在警察第一分局左旁^①，新中旅馆所在之处。因治平寺后来拆建民房，便将两尊铜佛移往长安寺，配供一处，分列左右，这时已是清咸丰末年，距今不过一百多年。

治平寺的两尊铜佛，也是明代铸塑，背后中部也都铸有阳文字迹可考，时间是天启年间，岁月较长安寺铜佛为迟。明代崇尚佛教，历世皇帝皆笃信禅宗，不仅在各处名山修建了很多庙宇佛塔，还铸塑了不少佛像，只要有奏请布施功德的，朝廷都下旨颁给。相传渝城这三尊铜佛，均不是本省塑造。万历年间那一尊，系由京都运来；天启年代的两尊，则由陕西方面运至。其间朝代既有先后，年岁又有迟早，表面看来没有差异，实则居中一尊，要高一尺多，两旁配供的，刚好矮一个头。身形也略有大细之别。想是明万历时，正当鼎盛之世，府库充裕，一切举措，自是不同；天启已届末世，虽然同样的尊崇佛法，究竟运用不能自如，所作已经显得拮据了。治平寺的两尊铜佛，在先也许并未料到会移到长安寺去与那一尊同供的，这里面有人事的变动，以及环境的变迁，岁月的转移，因此无知觉的铜偶菩萨，也尝到了人间的沧桑！

治平寺也是渝城古刹，与罗汉寺望衡对宇。其初，范围比罗汉寺广，除正殿置有两尊铜佛外，尚有五百阿罗汉堂，大山门正对古西湖池，香火之盛，为全城所有庙堂之冠。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重庆遭受战乱，治平寺也遭到破坏，不但庙堂摧毁殆尽，所有住持僧侣也全部逃走了。

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朝，重庆四大名家之一的王应雄（前明大将军），广事插筈，修建府院，布置庭园，治平寺被圈划在他的范围之内。好得王氏崇信神佛，特为菩萨留一地基，给治平寺辟出界垣，附于王氏土地的偏南，并稍事修整，聘人看守，早晚燃香供奉。但治平寺已大非昔比，香火冷落，到后来甚至没有人去朝拜了。

清咸丰、同治年间，王氏家族已经衰败没落，住宅庭园，也陆续分割售卖，先后改建民房。同时渝城日见繁荣，人口逐渐增多，已往原为荒林园圃的上半城，大部变为市街，王氏旧址因环境变迁，开辟街道，更拆掉不少，早已失去原有的面貌，治平寺更破落不堪，成为虚坛废宇，住持香火迫于常年开支无着，生活困难，竟招揽住户，将庙舍分散租与居民，到后来便成了一个大杂院。

杂院里面的住户，成份确实很复杂，既有肩挑背负、靠出卖气力为生的劳动者；也有擦粉涂脂、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梨园弟子、官府隶役。右邻的罗汉寺大和尚庆元，是一个能干的僧人，结交官府绅商，广事扩充庙宇基地，已据有江北相国寺等庙，又特地请当时重庆知府彭循、巴县知县沈正修，维持功德，将治平寺划与他接收，肃清杂院住户，出售地皮，维修院舍。拆迁的地区，则成为巷道，并用“治平寺巷”之名。至于原有庙址，则以右幅划给紧邻的龙王庙增设后殿，五百阿罗汉堂则归并与罗汉寺；那两尊铜佛，便抬往第一山长安寺内配供。一九三九“五·三、五·四”日寇飞机轰炸重庆，长安寺被炸毁，三尊铜佛被摧倒，长安寺当时

曾就地搭棚保护，后来移藏室内，预备将来重修庙宇时，再搬出来供奉。

1947.7.14—15《重庆夜报》

注

①即现消防总队停车房附近。

独家稻香村

“稻香村”糖果糕点店的牌名，相传出自苏州。在苏州城区热闹中心，正当“玄妙观”外一带商铺，多系售卖糖果糕饼。苏州人对点心很考究，注重口福，视糖果糕饼为日常必需；故经营这一行道的，便极力制作，花式百出，品类齐全；同业之间，互相竞争，精益求精，力树名声。若干年来，苏州六大糖果店，当推“稻香村”为全业之冠，远近驰名。

后来“稻香村”的学徒、师友，以及本家房系，出派分支，各设店铺，都用“稻香村”之名，以广招徕。于是不仅苏州一地，其它城镇，也都有了“稻香村”；店主也都与苏州观前老店有所渊源，无关的局外人是不能擅用此名的。

重庆原来没有“稻香村”，制售糖果糕点的店铺，都称“斋馆”，多为回民经营，故有“教门斋馆”之称。门前柜上，悬挂黑漆金字小牌一面，标明“清真教门”，以示与其它糖果糕点店铺区别。

教门斋馆挂牌的目的之一，在于标明所做荤食品中，不用猪油，茹素的顾客，可以购买。重庆过去著名的教门斋馆，

有大什字的“五福斋”，新街口的“永和斋”，都是开业数十年至上百年的著名店家。世代相传，历史悠久，名传巴渝。糖果业虽遍布全城，但仍以教门斋馆居多，名声最著，顾客购买，都注重教门牌名。

重庆地区，视糖果糕点为茶食点心，多用于馈赠亲友，所谓“水礼”，不象江浙各省嗜好。川人喜在饮茶之间，闲坐之暇，以糕饼佐兴。糖果之后，仍需备饮，故“斋馆”除制作糖果糕点外，兼营菜堂，虽门面狭窄，排场大小各有不同，但经营方式却基本一样，都是半设柜台，半置桌凳，俗称“双合铺面”。在三十年前，一般斋馆茶堂，每一桌上，摆有锡水壶一把，顾客可以自行添加开水，堂馆则往来调换水壶，至今川北各县城，仍然如此。

重庆较“新式”的糖果店铺，在二十年代初期方有开设。现在普遍制售的水果糖、洒其马、蛋糕、饼干等，以往是没有的。过去斋馆制作的，则视为“旧式”点心，一般已不宜作礼品馈赠，如绿豆糕、白果糕、杂糖、蜜饯等；但其中滋味各别，品种繁多，自有其特点，在本地老牌糖果店中，仍可购到，亦可慰情思昔。

至于“稻香村”在重庆出现，为时颇早，远在三十年前，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春季，系一位浙江人开设，地址在今陕西路中段，“鸿升堂”巷右侧，即中央合作金库对面。开业之初，专门制售糖果糕饼，并不附营茶座，与重庆一般斋馆不同；至于所有产品，完全江浙花式，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这第一家稻香村，租用两间门面：左面一间，隔

有木板，开有窗户，设置条案炉灶，是为作坊。内部的师傅工友，以及柜上经理人员，全系江浙籍。当时长江交通不如今日之畅通，外籍人士也不如今日众多，少所见而多所异，一旦新呈花样，别有创新，便引起一般注意与好奇，这是第一家稻香村在渝开创时，大获赢利的原因之一。

该店作坊濒临大街，窗户洞开，可以从街上瞧见里面一切情形。当其尚在准备开张营业、制造应市货品之际，工作十分忙碌，房内炉灶炭火熊熊，案板上刀声剝剝，厨师匠人为数众多，操作赶工讲说谈笑，吴语喧哗，引起来往行人驻足凭窗观望，果见所制糕点式样新奇，种类繁多，全与本地斋馆不同。于是，视为稀奇，辗转传告。所以该店自身并未大肆广告宣传，尚未开张，早已哄动全城了。

及至开幕之日，店门未启，已有人拥挤等待；刚一开门，柜台周围竟挤满人群，秩序混乱，甚至街道堵塞，交通停止，只闻一片喧闹之声。店中人慌忙应对，取货收款，包扎递交，近乎漫无头绪，内外繁杂，呼叫声不绝于耳；不少前来购买的顾客，被摒门外，无法挤入，这种盛况，在重庆不曾有过。当天营业兴旺，不到数小时，所有新制时鲜物品竟告销售完毕，货架空空，只好提前在下午打烊。

这第一家稻香村的产品，虽不出甜咸荤素的标准，唯因制法及外形与本地各斋馆不同，故能引起注意，由好奇而哄传，致生意兴隆。其实在原辅材料上，亦并无多大不同，兹举两例便可想见一般。一为蛋糕，本地原有的为四方形一种，稻香村则分为梅花式、手巾式，及白色（纯用蛋清调兑）

长条大块、双层夹心等多种样式；又如鸡蛋酥，本地原已流行，稻香村则有洒其马（此系满洲点心），且分别制成黄白二色；其它如年糕、蛋黄元（又名西洋饼）、软酥、京果等品种，皆要形式不同，或色彩各别而已。一般人视为新奇，少见多怪，莫不购买一试，由此可见营业必须谋求创新改良，方能致获大利。

除花色新颖，产品新鲜外，稻香村所用器皿及陈列布置，与乎经营的方式，亦与本地不同。其门面整齐堂皇不在话下，至于盛装各种糖果糕点的器皿，大多采用特制的竹笼本地原有的“蒸笼”，但外涂以漆，鲜艳悦目；其它台架箱盒，俱为定制，并各有花式雕刻，极引人触目，增进了产品的外观；顾客购买物品，勿论多少巨细，一律包扎绳捆，便利携提；所有绳线，染成红色，包装用纸印有店名，均很考究，无一不超越本地习惯；店员对买主和善亲切；拣选取送迅速敏捷，亦较本地店铺为优。凡此种种，皆属商业竞争之操胜算者。

渝城糖果店铺，以往无饼干、水果糖等品种。此类糖点，出现山城亦不过二十余年，但并不是从第一家稻香村开始。可是自那以后，各店仿效模拟，继起直追，互相竞争，各出新品。第一家稻香村的品种，仍属普通糕点，不过花样格式不同而已。该店开业不过半年，据说由于伙友匠师各怀打算，互见大利而分裂，自谋发展，便告停业，瓦解冰消。

不久，渝城竟有数家新型糖果店出现，开设于闹市大

街，但门面陈设均不如头家稻香村阔气，仅格式相同，产品相似，一望而知不同于本地斋馆；且招牌名称亦系新拟，店主也不尽是外乡人，或与本地合资经营，或系本行雇请匠师，意在投应时机，有利可图。但这样一来，反而见惯不惊，业务并不如头家稻香村好。于是，专务其业者，便寻找改良进步之道，新旧掺合，内外折衷，既集原斋馆经营的精美糕点，亦销外地传来的新式糖果。

至于现在，本城糖果业已面貌大变，“斋馆”已全部为新型糖果店所取代，且引进了西式糖果糕点，花色品种繁多，成品已非往昔可比。近十年，“冠生园”、“大三元”、“采芝斋”、“好吃来”等，相继在渝开业，风气转换，顾客亦不再求取陈物；欲一忆尝旧日道地渝城斋馆所制之风味，则需细加寻求，或许偶尔可得。

1948.5.11—16《重庆夜报》

重庆的浴室业

居留上海、北平等地较久的人，会不知不觉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到浴室去沐浴。现在重庆也有了浴室营业，但时间不长，是在抗战的前一两年才有的。

民国初年，重庆的浴室业，还是绝无仅有的。所谓仅有，因为确实只有一家，那就是开设在金沙岗上的岳阳楼。

因为早年人们对于浴室，都认为是家中的事。到了冬天，也是自备火盆取暖洗浴。后来，“岳阳楼”浴室开业，依然得用火炉御寒，不过每一个盆塘之间，用木板隔开，挂有门帘，似觉比家庭舒适方便，人们才乐于前往，并呼为“洗澡堂”。

在夏天，就根本不需上浴室了。“岳阳楼”的浴盆是木制的，用竹管通水，名叫“自来水”，设备十分简单，只有冬天生意较好。后来大梁子“优胜旅馆”开业，附设浴室，用铅管通水，并设磁盆，比之“岳阳楼”就漂亮多了。

民国十年间，商业场“话语楼”下的“浣薇”开业，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浴室，内分磁盆、汀盆，旁边附设理发室。

自此以后，重庆的浴室业，才算有了新的进步，业务也开展起来。“浣薇”的规模较大，内部布置和设备，也尽量仿照申汉等地澡堂的形式，而且有单人房间洗澡，更觉方便。

旅馆附设浴室设备，为时不久。如大梁子的“世界饭店”，肖家凉亭的“其春旅社”等，虽附设有浴室，但都是独立性质，与旅社相邻而已。直到民国廿年间，中央公园内的“涨秋山馆”，每套客房都备有浴室间，营业兴盛。于是其它旅馆，相继效尤，或设家庭浴室，或辟特别包厢了。

至于大池，最初本地人无这种习惯，一般浴室都不设置。直到民国十八年，木牌坊的“西南饭店”开业；楼下浴室特设大池，在重庆算是创见。开始时，前往大池洗浴的，多系外省人，偶尔有在轮船上任职的本地人前去，慢慢的才有较多的人去洗大池了。以后继起开业的浴室，便都设置大池，同时除擦背修脚之外，敲腿、捏趾等也相应有了。

妇女浴室。因为重庆根本就没有妇女去外面洗澡的，所以没有专门的女子浴室。后来，“其春旅馆”的浴室附设女宾间，随着则有平民浴室，辟专室招待妇女。最初去女浴室的，都是花界妇女，后来风气开通，才逐渐有家庭妇女前去沐浴。

此外，还有一种浴室，便是城外沿江边的“船上澡堂”。用一艘木船隔成内外间，价格便宜，空气流通，现在临江门、南纪门、太平门三处，各有一、二只木船营业。夏季沐浴，既感凉爽，又可浏览江山景色，只是就浴的人极其复杂，浴巾也不够卫生，但颇适应当地劳动界人士的需要。

以后，中央公园内，开设了一家又经济又卫生的浴室，先购买牌子，自己端水到分隔的洗澡间，肥皂、毛巾一律自带，取费虽低，但究竟麻烦，不久便停业了。

1947.9.9—10《重庆夜报》

重庆的人力车

重庆于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开始修建公路，最先建成的，是城外通远门至曾家岩一段。车辆行驶，也只能往来于这一段路程内。后来，城内的路线先后修成，车辆通行的范围才扩大了。

当时，只有数辆小汽车（轿车），都为军政要人所有。公路上通行的，主要是人力车，俗称“黄包车”，最初，只有二百辆左右。后来随着新建公路、街道拓宽，车辆数量也随着增加，最多的时候，有过九千多辆人力车。

人力车最早在重庆出现，却远在清代末年。那时既无公路，当然不能营业。宣统元年，重庆举行“赛宝会”，盛况空前，适成都方面由上海购了十二辆人力车，途经重庆，正值会期，便用来在会场行驶；一般人认为不过是新奇好玩，并非用以代步，会后也就运往成都了。

到了一九二五年，市政当局着手筹建公路，曹家巷“宏胜钱庄”有一位姓胡的商人，自备了私家人力车一辆，每天往来于五福街至下半城一带。当时每当停下，许多人感到稀

奇，争往围观，数月后这辆车也就不知所终了。

两三年后，市郊的公路逐渐修建，重庆市面上才正式有了人力车行营业，招雇力夫，出租车辆，一般人也用以代步，从此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了。

在开始流行人力车时，还发生了一些意外。由于拉车人技术不熟，车辆结构不完善，重庆又系山城，故翻车的事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将行人撞倒、车后的铁条，将倒下的人肚皮刺破、致伤致死等惨剧。

私人包车的盛行，是最近几年的事。公司行号，经理老板，置备私车，以图舒适，或显身份，也有预付押金临时租用一两月者。

1947.9.11—12《重庆夜报》

重庆的川剧科班

川剧科班在重庆演出，清朝末期就有了；但都不是本地组织训练，大多来自川南、川北等处；至于重庆组织本地科班，已在民国开元之后。最初的本地科班，名叫“普益”，由罗文江创办，于1915年（乙卯）四月正式开科设场。

罗文江是江北人，乡间土著粮户，拥有不少资产，喜好戏文，思想也比较开通，平时参加“玩友”打唱，自己又略解文字，便将一些剧本的词句修改，编成零星成段的新唱词。

最初他以开设戏院为业。早年戏院通称茶园，如民国初年朝天门接圣街的种德堂药铺侧的“阳春茶园”，江北汇川门外的“汇江茶园”，都是罗文江独资经营的，并且获利还不错。后来便单独设立了“普益社”，创办科班，招请一些川剧各行老角，分别训练儿童，宣称创立的宗旨是“改良戏剧，救济贫苦子弟”。

四月间成立后，不久改为“普益科班”。所有科生全系江北县本地的穷苦儿童，有的是完全无依无靠的孤儿，有的是

父母自愿送去学习的，全为男性，无一个是坤伶，人数约四五十名；地点设在江北问津门城垣内，自建了一座捆绑瓦房作厂棚，内设一个小戏台，每日闭门教习，很象一所学校。

经过了几个月，便开始边教边演出，正式设卖茶座，每天分上下午两场。一般人很感新奇，去参观的很多，同时收费较低，看客拥挤。科生中各种脚色俱全，也有资质聪慧，演唱出色的，生、旦、末、丑，均有佳才。科生的名号便以“普”字为标准，用各人本来的姓氏，配上所习行道取名，如旦角王普伶，邱普珑，小丑王普相，小生张普万等。张普万即后来在各川戏院搭班的张绍华。

前后训练了一年多，便正式对外公演了。罗文江特地在江北正街修建了一座新戏院，面积虽不算大，内部设备，按当时的标准，却算相当精致了。这座戏院取名“重光茶园”，茶园开幕之日，就是普益科班正式对外公演之期；当时特地邀请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县官、驻军到场参观，轰动一时。

普益科班演出时期不很久，便因罗文江去世而解散了。所有科生，也分别在本地或外埠戏院搭班求生，只可惜人才不多，渐渐便被人们遗忘了。

继起者为“裕民社”，这是重庆第二个科班组织，一切已较过去进步认真，科生中也出了不少名角。“裕民社”原在西二街东舞台演出，是一个组合的班底，各行均是一时的著名伶人，如正生褚安平、卢草廷，小生胡建廷（川剧坤伶胡漱芳之父），小旦罗芹香、钟香玉、伍碧臣，丑角傅三乾，花面

赵瞎子（焕臣）等，堪称重庆唯一的川剧班底。后因市政府一位叫李大钟的科长邀约，便用“裕民社”的名义，训练了一班科生。

这时已是一九二六年丙寅岁，重庆号称新商埠，由潘文华任市政督办。李大钟因爱好川剧，决心改良。他曾参加过卸任巴县知县的袁恩煌和本地人冯什竹等发起组织的“二二俱乐部”，编有《刺雍正》剧本。裕民社科班，便由他一力负责，招请名角分别担任教师，进行培训。这个科班的地址，便设在九尺坎。

裕民社科班正式公演时，已在后祠坡（即现在的中央公园上首）自建了一座戏院。科生男女兼备，旦角全部是坤伶，成就已比普益班大为不同。优秀演员如李筱钟（李大钟之女）、周金钟、周裕祥、刘裕能等，堪称特出之才，营业的时间也久，还曾西上赴成都等地演出。后李大钟去世，主角之一的李筱钟又因爱情自杀，主持不易，便告解体。此后便再没有科班发起了。

1947.8.10—11《重庆夜报》

附：

川剧坤角的由来

川剧班本来没有坤角。坤角的出现，在宣统元年。当时梅子坡的“萃芳茶园”开幕，由本市一家姓魏的主办，特从上海雇来女班京剧，俗称为“髦儿班”，主要角色都是坤角。坤角中最有名气的如郭少娥、郭凤仙、七盏灯、月月红等，一经演出，本地耳目为之一新。

到了一九二〇年（甲申）左右，才有川剧坤角出现，是旦角。到每年秋季枯水季节，江岸退出大片沙滩时，有一种专跑水码头的戏班，以船为家，每到一处，就在岸边扯起布幔长帟，搭起小型戏台进行演出；角色当然不多，却夹杂妇女文行在内。这种流动卖艺的戏班，一般人统称其为“真旦角”，由于文行是妇女扮演，便觉新奇。观众对象也为一般码头上下之劳苦群众。这些旦角，在技艺上谈不上什么造诣，表演也呆板，唱念更是黄腔顶板，至于化装，简单得不成样，甚至没有什么道具，穿着平常的衣服，加上粉红，戴上花朵而已。

关于重庆的戏院

清朝宣统元年，重庆才有戏院开设。有一个时期，戏院曾称为“舞台”，最初则叫“茶园”。这些名称，都是仿照沪、汉、津、京等地而来的。

尚未兴办茶园以前，演戏的地方，只有会馆，庙堂、乡镇，以及私宅的喜庆堂会。喜爱看戏的人，除了有机会应酬，参加各种祭典、宴会之外，平时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宣统元年，重庆举办“赛宝会”，场内开设了一家戏院，名叫“同乐茶园”，由川戏“义泰班”在此演出。虽是临时搭盖的竹篾棚，但面积较大，四周架有环楼，作为女宾看台。戏台前一行一行摆着条桌，上置白布，放有花瓶，上首及左右有靠背椅，下方空着，如私宅演堂会戏一样布置。

茶园内有茶房服务，观众每人泡茶一壶，桌上有瓜子、花生米等点心零食碟子，一面看戏，一面可吃零食。茶房川流不息的打毛巾，掺开水，收小费。每天演出两场。当时尚无电灯，只能用煤汽灯照明，故傍晚即停止演出。

清末，重庆的戏班已有数种，除川剧外，还有汉剧的“泰

和班”，陕剧（俗称老陕班），科班（娃娃班），京剧尚未入蜀。川剧又有“义泰班”、“鸿泰班”、“泰宏班”等。每班都各自拥有名角，其中尤以义泰班最为著名。

义泰班的生、旦、净、末、丑齐全，且为观众称道。生角中有李海生、褚安平、卢草廷、赛韦陀、马魁扬、胡建廷，净角有赵瞎子、李彝、廖莽陀，末则有包谷团，丑有九根毛，至于旦角，则更多了，如郑五、周四、尤春蓉、张桂蓉、伍碧臣、赛四妖等。

赛宝会的这个茶园，便是重庆最早的戏院，此后便陆续发展起来了。

赛宝会闭幕，同乐茶园迁入城内陕西街余家巷继续营业，利用梅郭庙内的万年台，当中的坝子用木架垫高，左右两厢的“苏楼”仍作女宾看台，内部布置仍与赛宝会一样。观众入场由先购牌子改为彩色纸印的座券，入门处专设售票处。如观众入园后再购票，在门口收票的人便大喊“代票一位”，于是专门的流动售票人便随后跟来收钱扯票。

茶园创兴之后，其它如餐馆、茶楼也相继开业，一时风气大开，景象一变，所谓“文明”、“改良”、“时新”、“开通”等名词，也跟着在人们口中谈论了。由于多年封建统治，内地民俗究竟比较固执，男女界限十分严格，茶园里虽有楼座接待女宾，也只限白天可以男女合观，夜间只售男票；男女宾进口，也是分开的；有一个时期，女宾进口处，还由治安当局派武装士兵把守。女宾看台上伸出一级短楼，设置长条矮凳，供随行的小孩坐看，考虑十分周到。

照明的煤汽灯由上海购来，若遇演神怪戏如《耿氏上吊》、《活捉刘氏四娘》之类，使用绿色彩纸临时把灯包起来，增强效果。民国元年，烛川电灯公司成立，各茶园才改装电灯，但光线微弱，夜间仍须辅以汽灯照明。

“同乐茶园”由赛宝会迁进城内后，不久，梅子坡的“萃芳茶园”（即龙王庙对面，过去的章华大戏院）、机房街（即民国路）的“悦合茶园”、白象街的“大观茶园”、花街子的“渝舞台”、大梁子的“华章大舞台”（即今一园电影院^①所在）等也相继开业，可谓盛极一时了。

当时的茶园，秩序很差，入场人数没有限制。每遇好戏或名角登台，便在楼上楼下尽量安座；茶园老板为增加收入，照例备有许多竹凳，平时堆放一边，遇到人多时，便不管背贴肩靠，尽量安插；甚至堂后和两边的走道，也售票让观众站着看戏。实在挤不下了，才关门禁止再入。

由于这样，秩序既乱，又因防区时代，驻军复杂，经常在开演不久，忽然观众席上某个角落轰闹起来，接着四座哗然，全场起立，转眼间竹凳与茶壶齐飞，呼儿喊妈之声同叫。戏台上更成为众矢之的，什么东西都向台上掷去，顿时秩序大乱，男女老幼慌忙夺路而逃。本来是观赏娱乐的事，结果以惊吓和悲伤收场。

治安当局对此自然关心，茶园也慌着急谋防范，消除混乱。因此，民国一、二年间，四川督军熊克武便举办宪兵，司令部设在蜀军政府侧（现西四街）。宪兵的装备和待遇均较一般军警好，灰色制服，用东方亮缎镶袖口，花纹纹边，佩章

用白铜镶金，腰束皮带，脚踏皮靴，挂一柄三尺长白铜鞘的拖刀，金黄挽手。三个一班，五个一队，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巡逻，勿论本军客军（当时重庆驻有滇、川、黔三省军队）的兵士，在路上相遇，都要站在一旁，立正敬礼，让宪兵过去了，方能动步。各茶园便由宪兵前来弹压，在观众席的中部靠后，特设座位，尤如供奉神像，以资镇慑。

民国三年，北洋军阀势力显赫，曹琨率北军入川，驻扎重庆学院衙门（今石灰市），宪兵便告瓦解。接着内战不止，城内巷战，多次发生肉搏，各色队伍此来彼去，经常有许多不同番号的军队同时驻扎，不但娱乐场所经营困难，其它百业也受战乱影响。由于重庆已开商埠，驻扎此地的部队，都设立了“驻渝办事处”，各自标明隶属番号。为了维持地方治安，曾由各军共同组织“各军驻渝联合办事处”。同时又产生了“军警联合督察处”，派了大队武装士兵巡游街市，每队由一队长率领，前面由一名班长手持特制的“令箭”，凡军人遇见，必须在一旁立定向它敬礼，队长则骑马随后，并随带木杖等刑具，可以就地执行惩罚。罪重的，则逮捕回处究办，还有执行死刑的权柄，真是威风十足。

于是所有茶园过去特设的“宪兵座”，便改为“督察座”了。督察巡逻队又称为“弹压队”，座前有一张桌子，蒙着白色台布，上首正中，特设靠背大椅，为队长的位子，其余两边，则散坐武装士兵。勿论午场夜场，每当开演不久，这批弹压队便来了。进茶园门时，先吹一声口哨，所有在场内看戏的穿军装的人，必须一律起立行注目礼，同时戏台上暂时停

演，并由“软场面”吹打一番，以表欢迎。

弹压队就座之后，再吹一声口哨，穿军装的看客才能坐下；同时台上继续演唱。弹压队除在场内就座镇慑，在园外男女观众进口处，也临时派士兵持枪守卫，约在演出结束前一时，便全体离去。临走时，又须照例吹口哨，起立，吹打欢送一番。

法严自然为治世之方，但也并非唯一良策。娱乐场管理如此严密，仍有不畏法的暴戾之徒，不管律例怎样厉害，竟以捣乱为习。当时王陵基担任“江巴城防司令”，最初确也收到一定效果，渝北南三岸，治安情况一度安定，虽然偶有纠纷，无碍大体，人们对于“王灵官”，很为敬畏。

可是镇压只能收效于一时。不久，地方上的不幸事端又接连发生，茶园里又出现过去那种混乱，肇事者除军人外，还有流氓神棍，互相狼狈为奸。城防司令部便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一旦哪里出事，只要把肇事者捕到，立即究办、采取速决，并不拖延时日，一经申明事实，马上就地正法，予以处决。由于在茶园发生纠纷而被捉到处死的，为数很多，都是在哪里发生，便在哪里处决，茶园门外，简直成了杀场。如梅子坡萃芳茶园、白象街大观茶园、朝天门外的汇江茶园等处，都处死过人犯。而由于其它案件，也采取就地正法的措施，便有遍地杀场之谓。

茶园改称“舞台”，是在民国五年之后。大梁子新开了一家戏园，招牌叫“华章大舞台”（即今“一园”），建筑形式仿自上海，并以机器转台、特别布景为号台。自此以后，商业

场修建完竣，西二街也开设了一家戏院名“东舞台”，厚池街内开设了“渝舞台”，上大梁子还开了一家“瀛寰大舞台”，于是原有的各个茶园，也顺应时尚，相继改名。抗战前，有的又陆续取名为“戏院”、“剧场”，以迄于今。

1947.9.15—22

注：

①一园大戏院——即今之人民剧场。

重庆有声电影之初

重庆最早出现活动电影至今已四十多年了。第一次放映，是在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岁，即一九〇五年）腊月中旬，有一个希腊国籍的人，名叫赫德威，用手提式小型放映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放映了几盘捉强盗、打酒店的滑稽影片。

放映的地点，在桂花街五世同堂周家院内（现中华路青年馆^①所在地），门票是竹牌子，正式售票入场观看。当时是新玩意，进去看过的人，都感到玄妙莫测。有的人在放映时特地私自揭起白布幕的一角，偷看后面有无舞台人物活动；有的则目不转睛地注视放映机；甚至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这是洋人的一种妖魔法术，摄魂取影”，可见当时一般人思想之简单了。

至于有声电影在重庆演出，已在一九二〇年之后。此时已有了正式的影剧院，电影摄制技术、故事内容都大有进步；而且也有了国产影片，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电影部，自产影片（由任彭年导演，任系明星影片公司女明星邬丽珠的丈夫）有汪福庆等演出的《孝妇羹》，以及《好兄弟》等，并运来

重庆放映。

有声电影第一次上映，是在重庆基督教青年会的电影部内，时间一九二五年（乙丑岁）八月，临近中秋节。青年会的地址，尚在陕西街万寿宫江西会馆内。总干事是一名外国人，叫谢安道。此人在四川多年，讲得一口道地华语，听来完全是本地口音，办事手腕老练。那时青年会在重庆成立不久，内设好几个部门，活动开展得很快。每星期二、六两晚放映电影，也正式售票。影片内容为宗教宣传。因是新玩意，观者踊跃，每当映期，十分拥挤。

在这以前，报纸上已刊载有声电影的消息，上海也公映了有声故事影片，但并不普遍。即在上海，也只有几家阔气的首轮影院，如静安寺路的“大光明”，福熙路的“南京”，霞飞路的“国泰”等，而且都是外国片。

就在这年中秋节前，青年会贴出告白，刊登广告，宣布放映有声电影。这一新事物的出现，轰动了全城，许多人都要前去观赏。放映地点和时间，作了改变，特在网球场用竹席搭起一座棚子，可容百多人，因为声音不大，每次不能接待太多的观众。

每天早午晚放映三场，从中午十二点开始，票价则比平常高出一倍。至于影片，则并非故事，也不是西方影片，而是蒋委员长（当时称蒋总裁）在南京阅兵时的情形。所谓有声，不过演讲时录音播出而已。声音既然很低，形象也较暗淡，自然引不起一般人的兴致，因此观看过的人，对有声片并不表示好感。前后放映了将近十天，便宣告停映，片子

也送到成都去映出了。

过了两年，小梁子木牌坊的新川电影院开幕（民国十六年元旦新修房屋，称为“重庆电影院”，为蓝文彬、李卓堂合资开办，这是重庆最完善的一所影院，但不过三个月，便失火烧毁，由蓝文彬等另建“新川电影院”）。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啼笑姻缘》，在后几集里，影院便自备有声放映机。这部影片并非全部有声，只在每一集中，夹上两盘有声片，但声音已较清晰，剧中人也用国语对白，开关门户、倒水的声响，都能听明，这使观众大为满意。《啼笑姻缘》本来卖座不错，观者很多，加上有声，更加轰动一时了。

至于彩色影片首次在重庆映出，也是在这一时期。本来着色影片来渝甚早，远在二十年代，各剧团在舞台演出结束之后，便接着放活动电影半小时，其中一半是幻灯片。影片内容，大半为风景、名胜、风俗民情，以及盛大的出殡仪仗、阅兵等等，全系外国摄制，其中偶尔有彩色的，看来十分悦目。

正式上映彩色影片是一九二四年（甲子岁），商业场“环球电影院”开业之后，片名《都璐公主钟情记》，是《天方夜谈》里的一个故事，这部片子从“环球”开幕之时即行预告，每场均用玻板宣传，结果在一年以后才上演，情况胜过一切影片。记得当时票价比平常高出两倍（包厢一元五角，堂座一元），连映十多天不衰。

国产彩色片也是在《啼笑姻缘》的后一部中，夹上有声

有色，可是色彩不及外国片鲜艳，不过在当时，国产片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错了。

在“环球”上映的影片中，有一部明星公司的《火烧红莲寺》，其中“红姑”一角，由著名演员胡蝶扮演，每次出现都着了红色，一望而知是着色的照像色，并非自然摄成。

“新川电影院”是重庆最早自备有声放映设备、最早放映有声故事片的一家影院，主持人是胡伯厚。继后夏云瑚、沈先培等主办的“国泰电影院”开业，有声片已经普遍了。现在彩色、五彩、七彩、立体等影片已臻普及，国产影片也大有进步，非昔日可比了。

1947.8.31—9.1《重庆夜报》

注：

①青年馆——即今实验剧场。

重庆的第一次运动会

一九三七年三月，重庆举行第一次运动会。会址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场，总裁判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会期五天，本市各大中学校都参加，情况很热烈；运动员（即选手）们竞争十分激烈，前往参观的人很多。

从那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地址仍在重大体育场。人们普遍认为重庆的运动会历史，应从那次算起。

其实认真考察起来，全市性的运动会，可以这么算，但若说是“最早”的运动会，应该还有比这更早的了。

最早在重庆举行运动会，是在一九二四年（甲子岁，亦即民国十三年）的二月上旬，地址在临江门外大溪沟的孤儿院操场。会期是三天，所有巴县、江北、南岸的中小学校，一律参加（当时尚无大学）。那是重庆真正的第一次运动会，（在此以前，只有各校自办的运动会）所以举行期间，前往参观的人，摩肩接踵。运动场四周并无看台，观众自带木椅板凳，附近居民还趁此机会出租椅凳。

孤儿院在大溪沟与观音岩之间，接近临华街网球场，为

基督教会的刘子如等所举办。那时距城内较近的操场，只有这里比较宽大，虽然郊区公路尚未修筑，七星岗、通远门外还是一片旷野坟山，但比“求精学校”的球场，要近便一些，交通也比较方便，可以由临江门乘船前往，故选定在此处举行。

以往的重庆足球比赛，多在星期六中午，在求精学校或孤儿院操场举行。这一次运动会，是由各中小学联合发起，巴县县政府的教育局参与组织；评判人员由各学校校长共同审核，教育局派员监督，所以并无主席等名义，当然更不需设主席台了。

竞赛项目，一有田径（当时称“竞走”、“赛跑”）、哑铃、木棍、球类，还有拳术，团体操、跳舞、耍刀等项，可谓竞赛与表演混合。例如那时江北毗罗寺县立女子学校，集体表演单刀，省立二女师的学生，头戴花圈，身穿彩衣，表演集体歌舞等。

各校每天到场，都是整队而来，前面由锣鼓号笛，奏乐为导，很令人振奋。场内布置较为简单，四周由各校学生坐地为界，普通观众，只能在这个界线的外围观看。那时体育运动的空气，不如现在浓厚，许多人观看的目的，也出于新奇和赶热闹。

当时还不兴“啦啦队”，每一个项目结束，全场照例鼓掌一次，并不很注重选手的成绩，没有纪录，也就不存在什么打破纪录了。

但是这次运动会中有一件事，却值得一记。因为以前没

有过，后来也未再见。当时南岸龙门浩，王家沱一带，停泊有美、英、法、日等外国兵舰数艘，其中两艘美国兵舰，一叫“威金”，一名“体尔”，水兵逢周末上岸，在曾家岩求精学校内，与本地的球队比赛足球。这次运动会，便约请参加表演赛。因此，三天会期中，每天都有外国人来参观，还邀请各国驻渝领事。哪知有两个美国水兵，穿着特制的彩色衣服，脸上涂了花纹，头戴奇形帽子，打扮得象马戏团的丑角一样，也来到会场，做出种种滑稽举动，引人发笑，时而在观众之后，忽而又参入竞赛之中，斜倒纵跳，乱喝怪叫，把全场的人，吸引来注意这两个丑角。三天会期中，每天上午即来，午后散会始去，来去都坐四人大轿，在途中也表现各种丑态。这种情况，在其它运动会中，不曾见过。贺兮讽兮，荣兮辱兮，国人自知。想必这也是欧美运动会中西人的一种风俗罢！

1947.8.9《重庆夜报》

重庆的第一家广告社

随着现代化商业的发展，广告事业也应运而生，同时广告也促进了商业发展，其作用不可低估。现在不少公司行号专门成立了广告部，宣传业务与产品；有的学校亦设立专科，培养人才，商界于广告的开支，也越益浩大。以重庆而言，大小商家，都以广告为招徕，花样翻新，巧妙百出，并争相罗致广告人才。应时而开业的大小广告社也为数不少，交易之巨更不待言了。

重庆最早开设广告社为商业服务，是在一九二六年。第一家广告社，在那年春季开业，创办人为蒲丁侠、尚仙白两人，他们都是研究美术的。蒲丁侠是成都人，曾在华西大学肄业，学过西洋画及水彩写生等。高仙白系涪陵人，国画家，兼工书法。两人都是重庆商界组织的“商业互助社”社员，可惜都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先后因病去世。

这第一家广告社，原为“商余公司”的广告部，并不对外接受业务；商余公司为重庆最早的新型百货公司之一。后因商界其它行号一再要求延请帮忙，同时也顺应形势需要，

便正式对外营业，招牌就叫做“美术广告社”。

蒲丁侠由成都来渝，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由成都发展至重庆；他是会里的干事之一，随同来渝主持会内的艺术活动，便有机会接触各界，认识了许多本地人士。后来加入了商余互助社，与商界中人往来就更密切了。

一九二六年，商余公司开业，这是重庆首创的现代商业企业——百货商店，特设广告部为其宣传。公司经理黎瀚生，专门带领蒲丁侠到上海去，观摩永安、新新、先施等大百货公司的布置陈设和宣传设计。商余公司是以当时的新式为标准，从橱窗美化、内部设备、商品陈列，以及包装捆扎，都讲求时新。蒲丁侠便从此离开青年会，全力以赴，悉心研究商业美术了。

商余公司后来还出版一种周刊，名叫“商余”，内容着重商品介绍，亦即广告宣传，用粉红道林纸精印，每期出版八开一张，附有漫画，由蒲丁侠等绘制；这也是重庆最早的漫画。高仙白为一年事较高的旧学先生，对于国画和书法，异常精通。原在本籍涪陵开设书店，为人忠诚，富于情感，后来到了重庆，因他的弟弟是基督徒，经其介绍与蒲丁侠相识，又经蒲的介绍，成为商余互助社社员。

蒲丁侠长于绘画，再配合高仙白的书法，自然相得益彰。及后，正式成立“美术广告社”，也系二人合作。地址设在陕西街，商余互助社二楼，所有对外一切交际接洽，承揽业务和布置，都由蒲丁侠独立负责。

当时重庆商业界，已经竞相采用广告宣传开展业务，不

过大都是在门市上运用，并且以百货业为主。广告的种类也少，报纸广告、街头墙壁的大幅广告画等，都很少见到。主要的作法，仍是在店铺门前和内部张贴告白。成立广告社后，便可代办电影院的幻灯玻版宣传、橱窗陈列布置了。

告白式的旧贴广告，用彩色绘制，多为对开纸。“美术广告社”成立后，业务很发达，蒲、高两人，相当忙碌辛苦。于是接着便有人相继组织广告社，其业务范围、广告种类、宣传方式、绘画技巧等，也不断创新。随着抗战发生，重庆作为陪都，不少工商业内迁，广告事业也日臻发达了，不但有美术师同人合组的小型广告社，更有了规模较大的广告公司。

蒲、高两人都患有病，身体瘦弱。高仙白因肺结核于一九二八年去世，次年蒲丁侠亦因肺病死于宽仁医院。二人身后都很萧条，一样的遗下寡妇孤儿，情况十分凄惨。现在广告业在重庆日趋兴旺发展，这两人的开创事迹，都堪留记永志的。

1947.9.26—28《重庆夜报》

记梅花少女歌舞团

民国十一、二年间，国内正流行黎锦辉所谱的歌曲，如《毛毛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以及《小小画家》、《三蝴蝶》等等。不但学校列为音乐教材，正式授课，许多家庭，男女老少，也顺口朗唱。同时，歌舞剧团也应运而生，为适合一般之爱好，投顺环境的需要，最初出现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创兴最早的，为“梅花少女歌舞团”。一经表演，风靡锐行，莫不趋之若惊，赏之习之，风头十足，成为一时的新奇事业。

主持梅花少女歌舞团的，为一擅交际的妇女，名叫魏莹波，浙江人，体格高大，面庞宽大，有如男子，既不秀丽，也不娇美，但有办事才能；手段圆滑，着眼于时尚趋好，顺应投机，便组织歌舞团正式公演；更以少女为号召，罗致人才，拥有名姝，以故所事成功，大获效果。最初本在上海立足，后又到苏州、无锡等地演出，名声更著。当时尚无第二个同业与其竞争，故驰誉遐迩，远近闻名。

一九二八年夏，梅花少女歌舞团应邀入川，来重庆表演。

主持此事的，为机房街（今民国路东段）悦和茶园，实则另有特殊人物，具非常之财势，方克罗致。闻最初派人东下接洽，系用川省某将军名义，担负来往全部交通费用，并保证营业收入。这位将军爱好逸乐，久著盛名，新奇玩意，一经顾爱，便亲自领略，耗费巨资也在所不惜。

梅花少女歌舞团在重庆悦和茶园演出，此处原属重庆戏院之一，民初建成，先后有各种游艺团体来此表演。歌舞团尚未到达，消息已传遍渝城，市民早见申报平时载文，极为关注。当时的歌舞，只在大小男女学校流行，每遇集会才演出，虽只有风琴伴奏，一两对青年简单化妆，动作也很单调，但已足以轰传巴渝，踊往观看。此次既闻大型专业歌舞团来渝，更加引动市民，必欲争先一睹。

该团到渝后，住在中央公园对面的中央旅馆，有男女演员五、六十人。演出之前，由主持者具柬招待各界相见，设宴于公园内靠南的“涨秋山馆”，当时该馆正经营西菜，往来其间皆属特殊人物。

到期，所订时间为午后六时，尚未入晚，已宾客满座。团主魏莹波便率领全体男女演员到来。少女演员均作白衫黑裙的学生装，男演员则为西服。

宴后即举行招待演出，地点在楼下大厅，先唱《总理纪念歌》、跳《水手舞》，然后是黄昏与徐桀莺两人合跳“探戈”，后则演出《麻雀与小孩》。此剧演员三人，大麻雀为张仙琳饰，小孩为龚秋霞饰，且歌且舞，十分精彩，窗户外也挤满人群，大有推倒门户之概。此一盛会，实开涂山字水间娱乐之新纪

元。

渝城各报，亦争先报导。最出力者，为每日下午发行之夜报《东方晚报》，主持其事者，为刘玉声。该报系四开版，印刷精美，为重庆发刊之第一家晚报，并首用红色套印。

自四月至八月，盛况空前，演员阵容也齐，有龚秋霞（号称影界四姊妹），徐桀莺、笑博士张绮，清唱张仙琳，以及钱钟秀，皮耐秋、蔡一鸣、翁兰魂等，年龄都不过十七八岁。再者有严月凡，为新派画家。原在中华书局，为《儿童画刊》及《小朋友》绘制封面插图。

歌舞团在重庆演出数月，卖座甚佳。这算是山城最早看到的现代舞蹈演出了。

1948.8.21—27《重庆夜报》

重庆长篇小说溯源

三十多年来，中国新闻报纸的版面形式，无甚变化，均以文艺为副刊，占据一个版面，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篇连载小说，为副刊内容之一，不可或缺。号称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各报也不例外。如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啼笑姻缘》（张恨水著），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人间地狱》（婆娑生即毕倚虹著）等。

重庆自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创办报纸以来，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等，与现今不同。至于长篇小说的出现，作为地方史实，有追溯之必要，也算是重庆新闻事业的历史，本地报刊沿革的掌故。

第一份在重庆出版的报纸，名叫《重庆商报》，系本地几位文士绅衿所筹办。社址在小梁子五公馆内，即现在大华饭店所在，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约在两年之后，便进行改组，正式作为重庆商会的出版物，报名上加了一个字，为“重庆商务报”，社址迁到下城县庙街中段二府衙巷内，即后来的巴县文献委员会院内。文献委员会是编撰巴县地方史

《巴县志》的机关，由政府管理资料搜集。

重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推《重庆社会现形记》。因内容触及商界，受到重庆商会的干预。报纸的生命，系于商会，对于商会停止刊登的意见，自然必须遵照办理。《重庆社会现形记》一文，先后发表三个月，共四五万言。此一长篇小说，读者印象很深，开创了渝城报纸版面的新纪元。

《重庆社会现形记》的作者田书府，仍继续在报馆任编辑，后曾一度任总编，可惜身体瘦弱，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因病去世，尚未到三十岁。

民国九年，重庆市面上，售卖一种小册子，书名《粉江繁笔记》，系用有光纸单面石印，对摺装订。书长四寸多，封面用红色彩纸，装帧触目。内容是一篇小说，约万多字，影射当时名人名妓，是用白话写成，未分章节，内容虽然不恶，但未免浅薄流俗。这书作者署的别名，实为本城王超常著。此人常去青楼，故将见闻写成小说，自行出资印刷。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还与刘涛公合办《鸿鸣日刊》（由新蜀报印刷所印，该所当时由宋南轩主持，地址在现今道门口银行公会内），仅半月后便停刊，王超常不久也病死了。

《粉江繁笔记》可算重庆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虽未在报刊上连载。但背景人物均取重庆，曾引起许多读者注意，流传颇广。

民国十五年以后，重庆新闻事业大有进步，先后出版的大小报纸有数十种。晨报、午报、晚报俱全，内容、版面也日益革新，对副刊更加注重，大非过去简陋可比，只是长篇

小说却很缺少，既无专门作者，报刊也未重视。

当时本地唯一的夜报《重庆晚报》，是销行最多的。社长赖建君，总编龚永陶，颇能努力进取；第四版的副刊，所载多系短小精悍的谐趣文章，最受读者欢迎；其报纸的生命，则寄托于副刊中的一个连载小说上。

这一部长篇小说，名叫《如此江州》。著者署名“然然”，内容以重庆中、下层社会为背景，描写当时的诸般罪恶，揭露种种黑幕，取材广泛，描写细致，文中所写地点、商号，均用影射或谐名，使读者一看便知。如永令巷，日本餐馆兼娼寮“又来馆”，则改称“再来馆”，商业场的台基旅社“大中华”则更名为“小支那”。

《如此江州》是一部警世小说。重庆晚报特辟专栏，木刻题名，按日连载，分段而不用章回，能适合一般中、下层市民的爱好的，报纸销路因而大增。

这篇小说连载两年之久，因作者离渝去沪，方告终止。先后三十多万言，后曾由永兴隆商号出面，印成专著发行，由上海印书馆印刷。但在每一页上，都附印一条广告，为此，作者与出版者一度发生纠纷。

民国十七年夏，重庆《东方晚报》出版，四开，在一版上曾连载《如此江州》第二集，排成三十二开书形，便于读者剪辑。但三个月后报纸停刊，该文又告终止。民国二十四年，商务日报改组，由王岳生、赖健君等接办，每日发行对开三大张半，其中一张半为副刊，题名“本地风光”，又有名《江州外史》发表，作者仍为“然然”，内容接《如此江州》，写作

技巧和内容，较一、二两集为佳。一年之后，商务日报又改组，接着抗战发生，纸张困难，各报紧缩篇幅，发行联合版，长篇小说就告停止。

十几年后之今日，重庆报刊的长篇小说，已有多种，尤为晚报注重，作者也多起来了，但回溯初期，不过以上三种而已。

1947.3.17—22《重庆夜报》

男女杂坐之始

早年，公共娱乐场所，男女是不能混合杂坐的，例如各处会馆神庙出演戏文，正殿之外，左右则配有苏楼，系为一般首士会众眷属观看之所。如普通妇女前来看戏，都是在苏楼之下，或戏场左右，自带条凳，与男人互相隔离，各有界线。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重庆举行赛宝会，会场设在今菜元坝河岸，场内创设梨园；此乃重庆开设戏馆之始。虽然男女都可前往看戏，但周围建有环楼，乃专为女宾准备的座位。此后，城内正式有梅子坡的“萃芳茶园”，余家巷的“同乐茶园”，白象街的“大观茶园”，机房街的“悦和茶园”开幕，都是特别修建的房屋，也照例辟为环楼，售卖女宾票，而且男女进出口分开，距离较远，方向各殊，毫勿紊乱。

以前戏园每日照例发戏报一页，大小如现在的八开报纸，用有光纸印刷，木印或石印，多用红黑二色，上面详列当日午、夜台剧目，以及演员名字，清晨由专人散贴。在民

国四、五年间，戏园常起争端，打架斗殴，治安当局曾一再严办，且将肇事者就戏园门外砍头示众，仍难制止，而出事又多在夜间，故各家茶园的戏报上，还印上“午台男女合观，夜台专售男票”等字。至于男女杂坐之事，那简直是有干法纪的行为。

到了民国九、十年间（即公元一九二〇年左右），重庆已有电影院出现，地点则多租借戏园改演。男女看客，仍是依着习惯，不能混合杂坐。后来中陕西街（今陕西路）万寿宫内的基督教青年会，每逢星期二、六，放映电影（重庆青年会最初成立于此，由外国人谢安道主持，后来才迁至大梁子公园路，并自建房屋）；所有影片，大多是宣传宗教，但为营业性质，收费很低；男女均可参观，地点则在大礼堂内，虽无楼堂之别，但女宾座位则在靠左一角，用布围着，以示隔离。不久，几位留法学生回到重庆，在打铁街新华茶楼开设“智育电影院”，虽系一幅平楼，也曾用木板隔别前后，分售男女宾票。

直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三月，成都人吴特生由法国归来，特在重庆开办“寰球电影院”，创设家庭包厢，才算破天荒地有了男女杂坐。

“寰球电影院”并不是重庆第一家放映电影的娱乐场，在此之前，已有余质彬（四川军官余际唐之族弟）开办的“光明电影院”，地址也在“寰球电影院”原处。至于第一家电影院，乃是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元旦日开幕的“涵虚电影场”，地点在木匠街“宜春茶园”内，即今字水街

朝天驿左侧，系浙江人陶义文所办。不过以往皆是因地制宜，利用现成场地，“寰球电影院”则一切按照放映电影的要求而布置。

吴特生是四川成都人，为早年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九二五年返国回川，便在重庆开设“寰球电影院”，租借商业场“东舞台”为院址，此处原为“裕民社”演出川剧之所，内部宽阔，适当商业地区。吴特生对于电影业务，颇善经营，所有布置设备，均非重庆其它电影场可比。院内环楼，仍系依照男女分座，但是特将二楼正对银幕的居中一部分接出扩充，用木栏分隔为大小十八间，每间安置坐椅十座。八座、六座不等，取名叫“家庭包厢”，凡包订一间者，即可男女混合杂座，此系便于家庭合观，不致分散，名正言顺，竟告实行了。

这一新的名目，实际开创了重庆娱乐场所男女杂座之始。当时竟能实行无阻，却也有原因。“寰球电影院”虽是吴特生主持，但系股份组织，而股东人数不多，且为当时军政权要，如省长赖心辉、省府秘书长沈乐丰等，均有关系。每场持有武装兵一排开来维持秩序，护守内外，院方又曾向法国驻重庆领事馆注册，标挂蓝白红的法国旗帜，并用法商的题记，还找了一个名叫杜尔布的法国人来当总经理。其实并无别的作用，只是每场佩带手枪，站在门外，用大鼻子来威镇一下，然而竟生了效果，秩序很好。

家庭包厢，原系便利观众一家合坐欣赏电影，但后来由于营业之故，便可单独分售包厢票，只要谁买了包厢票，不

分男女，也不问是否一家人，便可进入包厢，杂坐一起。“万事开头难”，这一风气“多见不惊”，渐渐习惯，继后梅子坡的“联星电影院”，木牌坊的“重庆电影院”等，也照例辟出包厢，接着其它川戏院、京剧场也跟着照办，男女杂坐更是无所谓了。

1947.7.23《重庆夜报》

渝城四大名家

重庆臻于繁荣，至今尚不到三百年。正当明末清初之际，扬子、嘉陵两江围护的山城，还是一片荒芜，只有近河岸一带有宅院商肆。崇祯末季，张献忠入川，渝城遭受战乱，几乎烟户灭绝。后来幸得四大名家的开业兴基，方才渐渐地复兴。

所谓四大名家，系王、简、蹇、黎四大巨室。他们都是具有官阶，享有隆重恩赐，在渝城各据一方，平分春色的。那时是插筍为业，深恐无人肯来居荒，所以四大巨室任意扩充面积，施展圈划手段，多多益善，有谁来加以限制呢？

最有名的是王应雄，他在明朝崇祯年间，官居大将军之职，屏守江州一带，可说是在渝城修房造屋最多，尽情享图安乐的一人。他的府馆别墅都在下城沿江一带，与市场相接，一切布置受用，穷奢极侈。也许他忘记自己是受命守土，竟然作私有子孙之计。因此，便给御史参奏，调京陛见，预料结果凶多吉少。哪知正当其时，张献忠率部迫近江巴，警报飞传，朝廷只好派他返回四川剿灭。王应雄驾轻就熟，得地

利之便，迭次告捷。这一来，他自然功高恩渥，视重庆为本土，广事插筴，大兴建筑。清兵入关，大明失统，他就在重庆作起寓公来了，安富尊荣，享乐无穷。他的本府在现今的龙王庙治平寺一带。药王庙原系古西湖池，也一度辟作王府园林沼塘，相传王应雄曾与张献忠所部在城内大战数日，双方死伤无算，所有遗尸全部抛入西湖池内，故又有“万人坑”之称。

至于王应雄的地产，更是不可核计。由城至乡，远至永兴场、土主场，可谓百里之内，不履他人地皮。直到清朝乾隆年间，王氏子孙零败，不肖者多，所有产业，陆续荡尽，甚至所住私宅，也变卖出售，变为治平寺、罗汉寺了。

其次是简天官，姓简名毅。他是奉旨退休，在重庆颐养晚年。但是他的后辈，却代有官职，继承俸禄。其住址在重庆靠西一带，府第广大，也大肆扩充园林作为私人游息之所，其面积上达七星岗，左右至会府、莲花池、德兴里一带，所有田地均属于他所有，其财势略亚于王应雄。

第三家为黎氏，名修惠，官居兵部侍郎。明末，与王应雄同奉廷召，剿灭张献忠，因有功勋，便在渝城营谋基础。他的子孙最多，不少担任了清朝的官吏。黎修惠的府第在下城近河一带，即今望龙门白象街、中央公园等处。屋宇堂煌，讲究轮奂之美，与王、简二家广事占有略为不同。

此外，还有一个蹇进贤，也是天官告老退休。他的故址，今日实亡而名存，就是马蹄街上面的天官府。蹇天官的作为，又与前三家不同。他虽有高位显爵，居住渝城时，年岁

己高，并不重荣耀威势，却一意在诗词书画方面讲求，专门接纳才人文士，以琴棋酒茶为消闲。他的天官府中，也有亭台楼阁之胜，遍植花草竹木，以清高自命，故名声最大。

这四大名家，都受朝廷恩渥，各自竞谋荣典，先后在城内建立起许多牌坊，一门之中，几乎忠孝节义都有出现。只要他们具报朝廷，便照例有旨褒扬，修建大石牌楼一座。现在林森路中段，一二三四牌坊即是石牌林立，早年便因而命为街名。其实牌坊不仅遍于城内，四大家各于自己地界之内，也建立了不少，至今附近各乡还可寻见；当年，单城内便有四百余座。

渝城四大名家，至今不过三百年左右，早已地异人没，甚至烟祀告绝，以往的盛大丝毫没有痕迹可寻了。民间所谓“千年田地八百主”，确不失为至理名言。

1947.7.12—13《重庆夜报》

午饭時計

现在大多数人都有钟表，公司行号、机关厂家更以時計为作息准则，全国还统一了标准时间。可是在数十年前，重庆只能用“午时炮”的办法统一时间。每天到了正午十二点，便鸣炮一响，远近可闻，告诉大家时间的早迟。

“午时炮”最初在道台衙门外月台坝施放（地址在今莲花街第一模范市场），后来，迁到后伺坡中部土堡上（现公园中山亭处），再后，又移到南岸玄坛庙旁海关草坪。由每天午时一炮，改为每逢星期六午时施放，作为休假的通知，这已是民国十五、六年间的事了。

清代，重庆道台衙门外面，东南两辕门进口之侧各有楼台一座。每天早、午、晚，有乐工在上面三吹三奏，这成了一般人早、午、晚三个时间的标准，很多人便以这三吹三奏为一日三餐的時計。再追溯回去，则有“老鼓楼”的“铜壶滴漏台”，地在西四街口下首，民国十九年才拆除。

在清光绪中叶，时钟虽已流行，但并不普遍。渝城只有少数达官富绅家中备有大自鸣钟及怀表，时间标准也不一致；

还有更多的人以日出、日斜、日落为起居的依据。可是那时重庆市上，竟有一个“午饭時計”，乃是太平门顺城街云南帮经营汇兑业务的“天顺祥”商号所使然，该号有个白案厨师夏师傅，他成了下半城一带地方活动的午饭時計标厨。

“天顺祥”的主人叫李耀廷，与江西帮的“萧怡丰”同为渝城两大票号，营业范围很广，往来多系达官显贵。商号内供应奢华，对饮食异常考究。每天除正常三餐规格形同筵席外，中午时分还要开一道点心，厨房中聘有红、白两案准师多人。

老夏是“天顺祥”白案掌脉师傅，专门制做各种点心，手艺高超，在同行中很有名气，据说他可以做出二百多个不同的花色品种。

光绪三年，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次年到重庆阅兵，到达那天，首先到“天顺祥”拜望李耀廷。行客拜座客，这是极少有的荣幸。丁宫保的官舟泊在太平门，由船上抬往“天顺祥”的课银达数万两。“天顺祥”的名声因此更传遍全川。原来丁宝桢是贵州人，未做官以前，在云南期间，李耀廷多次接济过他的活动经费，二人有一番私谊。丁宝桢后来荣显了，又适来四川，感激故旧，便于入城后先行拜望李家商号，谢往年资助之力。这对于以后“天顺祥”的业务开展和信用上，当然起了非凡的作用，时至今日，还为一般人所称道。

丁宫保往拜李耀廷那天，是临时去的，并未预先知照，“天顺祥”毫无准备，供应接待，一应俱无。时间正在中午，恰值号上开点心之际。当天传出的种类，名叫“四季花”，

即一包、一饺、一烧卖、一荷叶卷，共两甜两咸。虽有上宾降临，也只好将就这一品种端进客厅。李耀廷很觉过意不去，连连表示“宫保驾临，未克准备，只好用小记常点敬奉”。哪知丁宝楨吃了之后，反而盛赞制作极佳，很合口味；还说打算再来一份。这真出乎主人意料之外，高兴极了。事后，李耀廷将老夏每月工资二两之外，特别另加一两银子。

老夏经此一事，名气更大了。他居家萧家凉亭上面，靠近长安寺，自备有小黑驹一匹；每天将近中午，便骑着小马，由家里到号上做工。他由家里到太平门，要经过好几条街，时间很准，从无延误；沿途人家每天只须瞧见老夏骑马经过，便知时已近午，准备吃中午饭了，所以人称他为活的“午饭時計”。

1947.8.24《重庆夜报》

郭志达三任巴县

清光绪七年，郭志达首任重庆府巴县正堂，为政清廉，深受人民拥戴，有干吏的称号。光绪十六年，第二次又复任巴县，这是没有前例的，即使后来，也没有再见有哪位知县复任。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他竟又第三次复任巴县，这真可算空前绝后，不但任中能获民心，上级也很器重。

对郭志达，人们褒贬各半，有人指他不免贪吝，也有人认为清明；事后追忆，该人确非驽才。然而既跻身仕途为官，利禄观念何尝没有？只是要钱自要钱，作事自作事，与一般贪鄙的污吏大不相同，也就在此。可是三任巴县之后，调去内江知县，不到四月便去世了。身后萧条，重庆方面，尚有哀启张报，由各方惠赠奠仪，方克治理丧事，棺殓成礼。从这点看来，也就不难想见干吏虽有能为，其死时又是如何？

关于郭志达在巴县任内，政绩颇为不少，这里举两件事，对其能力和作风也可见一斑了。

他是一位会弄钱的亲民之官，但是要弄的对象，却非普通百姓，且须取之有道。尤其是不务细微，遭他敲索者，也

能甘心奉献，不致含恨，反而要感谢他的庇护；这是很不容易的手法。巴县龙岗乡有一个姓杨的孝廉，本是当地富绅，田多宅广，后来又中了举人，更是得意忘形，大事扩建屋宇，宴请宾客。他的座宅前后数进，由正门入内直达厅堂，有个长方形的大天井坝，两旁环立朱漆万字廊栏，正中的大厅，有丈多长的屋檐，定烧的琉璃瓦镶盖，檐口朱漆横梁，伸出瓦桷一列，与左右两厢连接，瓦桷全系圆木，尽用光漆。伸出的檐口，则雕成盘龙图案，一律贴金，辉煌美观，富丽不下王府。杨举人自以为增光凑华，不料此事竟被郭志达知道了，真是一个绝好的敲取机会。他于是特地发下牌报，作一次巡行，率领巴县正堂衙门全部仪仗差队，渡江到达南岸，顺着各乡场镇，直到龙岗。知县大人未至之前，先已有公差在前面照会各乡场镇的首人绅士，例须迎候接待。龙岗乡的杨举人，为了表示恭维起见，特地准备于郭志达到乡之后，在他的座宅里设宴奉请。哪知郭志达到乡之日，竟先行直到杨宅，名为拜会。杨举人没有料到，更不知其中另有意图，反而引以为荣，知县大人的仪仗到了门口，赶忙亲出迎接。

郭志达在大门下轿之后，与杨举人并肩入内，漫步参观，盛赞这屋舍精美华丽，杨举人内心很觉得得意。后来行至正厅檐下，郭志达停步细看，忽然大惊，说道：“想不到本县到府上来，恍若置身金銮丹墀，孝廉公真是洪福照临了呀！”杨举人陡然听了这话，虽然感到诧异，但却莫明其妙，瞠目问道：“县台是何言耶？”郭志达便抬头指着檐口圆木上面雕绘的团龙描金图案，说道：“这不是宫殿的制纹吗？非帝王哪

能有这种装饰图案？”在封建时代，品级享受，图纹穿戴，非同小可，可能涉及叛逆之罪，早吓得他惊魂千里。当着本县命官在此，又系亲自目睹，倘若报告上宪，呈奏朝廷，那还了得？立即双膝下跪，叩求宽恕，并恳请隐情救助。这一来，正中郭志达的心怀，不用说，乘势敲取，满足所欲而后已。就这一事，便可想见他的手段超乎寻常。可是他三任巴县，均能深得民心，一般平民都不以其贪鄙而致悲愤，也自有原因。

他的另一作风，是对于民间的事件，能出以明快奇妙的处理，当机立断，勿论门户，一经承询，只要是公开昭明的问题，不管如何严重，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民间交加颂扬，互获安宁，这便是他手法高明之处。

光绪十六年，第二任巴县时，正值本城柴家巷巨室刘道台家，发生打死厨工、引起全县佣工轰闹暴动一案。对于这事，他应付处理得极为巧妙，竟使原、被两告认服，一场大的风波，才告平息。

柴家巷刘姓，系本城巨家富室，座宅很大，后面与都邮街董家公馆（今新生市场）相接，正面与周员外（今青年路、望衡对字，即现在国泰电影院所在之处。这一地产，也系刘氏卖出。当时弟兄数人，称渝城宦门。刘氏名兆麟，字秉钧，兄为遂宁乐官，弟系顺庆学官。刘兆麟曾捐了一个贵州道台，因禀见之费不足，长期候缺在家。他先后用了四万多两银子。这笔数目，在当时已经大得惊人了，还是无法疏通，便失望返家。

刘氏养尊处优，极力讲究官场排调，雇有专门厨师治理

三餐两点。有天夜晚，召厨师到内厅吩咐次日菜单，并指点当日失误。厨师申辩，言语顶撞，刘某当时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闻言大怒，认为这是以下犯上，顺手拿起手中烟枪打去，正中厨师头部，当时便气绝身死。

厨师的家属闻讯由乡间赶来，当然不依。消息传出，全城佣工愤愤不平，相约齐集刘家门前，计有数百人之多。众怒难平，一时街巷为之涌塞。专制时代，这是少有的现象，刘氏惊惶无措，急奔巴县衙门求告。

这是地方职责所在。当时的步班头脑萧二麻子颇有才干，为上官所倚重，郭志达便召萧商量办法，决定先派步班二十余名，武装（羊角叉、春秋刀、蛇矛、梭标等）前往刘宅，由后门悄然而入。正值前门哄闹之际，萧率同步勇，猛然由内冲出，大声宣布：“大人已到了，正要捉拿为首的流神痞子，你们还不快走呀！”拥挤的人们，因无领头组织，经此威吓，便纷纷散去。郭志达随后赶来，对厨师家属先行慰问一番，然后劝双方和解，由刘家出银一千两作为抚恤。乡下人迫于威势，只好答应下来，领尸掩埋，还遵照郭志达私下的嘱咐，自认死者有冒犯主人之处，方才激起愤怒，酿成死亡，尸亲既然不愿诉之于官，众人也就不好再论是非，于是一场风波，便告平息。由此可见郭志达的手腕了。

1947.7.19—21《重庆夜报》

耿巴县(耿公达轶事)

清光绪三十二年，署理巴县正堂的耿公达，字保奎，为人直爽，操政精能，有干吏之称。在任两年多，政绩颇多，百姓敬畏，豪绅收敛，众人送他一个“耿巴县”的浑号。他在巴县任内的许多事迹，在民间有故事传述，但也有人评论他太专横，说他是酷吏。在传叙中，有的人把“耿巴县”误为耿鹤皋，把两人的事迹混为一谈。其实耿鹤皋不是县令，而是重庆知府。此人亦称干吏，但贪鄙狡猾，曾因涉案解往成都受审，与耿公达“耿巴县”风马牛不相及。

“耿巴县”对于地方治安，异常重视，每遇盗窃案件，捕获的人犯审问之后，按例要给予惩罚，他却别出心裁，另用一法。据说，他用肥肉熬成油汁，不放任何佐料，用瓦钵装好，差役将盗贼的发辮高悬在堂口旁边柱头铁环上，使犯人仅两脚趾尖落地，脚底斜立，命犯人两手捧滚热的肥肉油汁急喝，脚下则用铁爪轻搔脚板心，使其口中吞下油汁，腻人五脏六腑，油气直冲顶门，而脚下又奇痒难熬，又哭又笑。

当时用此法惩治盗贼，地方竟获安靖。

耿公达平时很爱改换装束，扮着普通百姓模样，游逛街市，了解民情，遇有不法无理的，便出面取缔干涉。有一次，他行经过街楼附近，见三重土地侧边一家卖丝烟的店铺门前，坐着个年轻妇女，当街袒胸露乳，哺喂婴儿。这在当时，认为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耿巴县便走上前去关照她不要这样，有伤风化。那妇人不听劝告，反而责问：“与你有啥关系？多管闲事！”耿巴县说：“谨防遇到耿巴县，要受处罚啊，还是不要触犯为好！”那妇人更气愤的说：“耿巴县敢把我做个啥子？老娘喜欢怎样便怎样！”不久，便有差人前来把这个妇人押到巴县衙门，责打四十皮条，罪名是“当街哺乳，不顾羞耻。”第二天，那妇人依然如故，毫不改悔。昨天劝她那人又来警告她：“耿巴县如何？你应该早听我的话。”妇人不知这人便是堂堂县令耿公达，竟口出不逊，破口大骂耿巴县凶残。过了不久，又有差人来，将妇人逮往巴县衙门，受责掌嘴六十下，罪名便是“辱骂官府”。妇人这一下痛极了，也知道了耿巴县的厉害。不敢再有触犯。

旧时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良家女子，更不得随便抛头露面。大年初三，有妇女前往第一山长安寺、罗汉寺等处烧香拜佛，如系年轻女子，无长辈夫婿携同，而且搽脂染红，招摇过街者，耿巴县便命差人拘来乞丐告化子多人，令他们当众将妇女脸上的胭脂水红，用舌头舔舐干净，然后分别背负背上，送返其家，伤丈夫公婆管教。

当时“耿巴县”之名，真是妇孺皆知，据说有的妇女为

了吓哄孩子，便说：“再哭，耿巴县就要来了！”由此可见人们对其印象之深了。

1947.6.11《重庆夜报》

记保芝舫

本地流行着一句歇后语，凡认为所作之事所说之话，多余而罗嗦的，便指是“保大老爷修新城”，意为“格外的圈圈”，即不必要、多此一举的意思。新城在江北县城靠北，就原来的城垣，自西而东，加一幅墙，较县城面积约小三分之一，西与金沙门相接，东迄问津门、东升门之间而止，并在向西向南两方，各开一门，名为“永平门、新城门”。

新城内面，全系田土农户，此外有吕祖庙和火神庙，以及私人园林数处。清朝末年，巴县名人马绍元（即马二老爷）的马家公馆，便是其中之一。民国以来，江北、巴县户口增多，商业日趋繁盛，新城内面的房舍，也陆续建修，孤儿院、治平学校先后成立；抗战时期，迁入的人口越来越多，已成为闹市了。

修建新城的人，都知系保大老爷。他是江北理民府司知，这一建筑，可算他在任“政绩”之一，其人之所以出名，也是由这件事引起。保名芬，字芝舫，满洲镶黄旗籍，与爱新觉罗支系最近，与当时的嘉庆皇帝，是表兄表弟，因情谊深

厚，极受恩宠，故保芝舫也自视高傲不可一世。

嘉庆二年，他受命为重庆二府，接胡二府的后任。二府衙门，在县庙街偏右，即现在望龙门对面，其职权是执掌一切偷盗奸邪、刁拐恶霸等关系地方治安的事件。保芝舫身任二府，算是称职的，却又不满意二府的官卑职小，排场不能称心适意；自己以为出身不同，又系皇亲，便不免任性。然而清朝制度严格，又不敢过份冒渎僭越，因此，他在任的行为，便往往超过范围。

二府照例要每天上府道两衙谒见，所有仪仗，仅能排步到达而已，不能喝道呼衙（旧制知县以上官员出门，有公差喝道，令“蓝帕白帕”揭下来，茶馆酒店坐客起立，候官轿经过）。保二府虽格于规制，却又不甘冷落，他每次上府道衙门去时，一切如仪，但是退后踏出辕门，即开始“喝道”，势态威严，有时行经上司衙前，不便冒制，可是一过仪门，立即依然喝道，一点不肯放松他的排场，所以人们称他为“软进硬出的保二府”。

那时江北为一厅制，设有厅官，直辖于重庆府。江北虽有城垣，可是居民不多，只在靠江一带，略有市街，后面大多是田土荒林，间有几座庙堂而已。居民多以木货、推船为业，所有本地、外籍船户，都聚集北岸；其中有云、开、万、大红旗、荆、襄、辰等帮，彼此为了装运客货，以及其它争执，常起纠纷，甚至引起械斗，江北厅大部分公务都是办理此类事件。

重庆二府（即同知）保芝舫，以皇威自居，于体制多有

冒越，同僚、上司虽不能直接予以弹劾，官场谈论终于上达朝廷，不久便诏命调为江北理民府理事同知。这是人事关系，保芝舫倘若没有那一种特殊的背景，自不可能。朝廷因他既爱理事，才采取了这一照顾性措施，同时又要考虑他现有的品级官阶，所以便特别将江北厅改制为理民府，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开官场上宪的不满，调他到这里来，可以任其冒越，无人干涉了。

江北县城，范围不大，且因年久失修，颓毁甚多，历届厅吏，本拟兴工培补，重庆府也曾数度禀呈上司，终因库帑有限不敢轻动，地方经费又很不足，迟迟不能批准动工。保芝舫接任江北理民府后，便计划先行培补城垣。他是有钱的，动用点库帑公帑必没有问题，只是先行预算，禀呈核准，便可正式动工。

可巧，此时江、巴、璧、合等县边境，不但盗匪蜂起，还有大股暴乱骚扰。最有名的是王三槐与李短搭搭两股，以及后来的张大烟杆（又名张瞬子）、谢寡母等支，势力庞大，正散布在合川江北两邑之间的草街子、悦来场、山峡一带，这些原都是翼王石达开在川的旧部，因失统而无法聚集，便小股流动。江北警报频起，火警累传，保芝舫为确保江北城安全，便决定修建新城。

江北新城，若非保芝舫也许不能成就。他一方面是自己拿出一笔钱来；至于动用库银，在他既为满族，又系皇亲国戚，奏准是有把握的。呈报修建新城，适逢地方不守，名正言顺，所以不久获上司批覆，便动工修建了。

关于重庆二府迁往江北厅，巴渝俚巷间另有一种传说，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谈论的人很多，这里一并记述。

相传重庆二府迁往江北厅，时在道光初世，渝城有名的一些票号钱庄，相继发生抢案数起，或因库房存款遗失，或者课银被盗，先后具文呈报二府衙门，请察勘缉办。府县两司选派干差前往失窃现场察看盗迹，竟毫无线索可寻，各方下手侦探也没有结果，似成悬案，不能解决。被窃各家虽然接连催请，府县两司只能严飭步差赶速办理，甚至科比从重，仍旧无效；而且窃案仍有发生，以致商界风声鹤唳，市面趋于惶惑不安。当时重庆二府姓金，满族人，系由云南镇雄调来。为了这些巨窃案件，与巴县知县吴鼎，意见不合，颇有齟齬，彼此职责所归，不能旁贷，但金二府以满籍关系，处境特殊，吴鼎则累受责难，很感棘手。

巴县知县衙门步班差房，有教师名邓伟，山东人氏，武功操练有素，除了拳脚之外，还能登墙越壁、高来高去，故巴县知县衙门差房，特请他教练步差公役，传授拳棒刀尺。邓伟每天晚上也就住衙门差房。

一日深夜，已近三更，大街小巷早绝行人。下城比较繁盛市街的两边店铺，门外悬挂的四方白纸檐灯二更以后，也就油尽灯熄。那天正当下旬期间，万星闪烁，黑夜中一片茫茫，山形室影，只能勉强可辨。

邓伟在过街楼朋友处夜饮过迟，这时顺着陕西街经道门口、莲花街，回转巴县衙门。将到县庙街口，这是一个转角路道，左通白象街，右去老鼓楼，他忽然瞧见一条黑影由下

而上，飞登到白象街与县庙街交汇的过街园光门风火墙上去了。这在其他寻常的人，也许还不致注意，可是邓伟眼明机警，身手敏捷，早已看清那黑影是一个人，他想深更半夜，飞墙越屋，绝非善类，必定是盗贼无疑。为了弄个究竟，便决定跟踪前去。

邓伟身上穿的长衣，原已搭在左手腕上，好得正是短挂紧身，便随着攀上墙头，伏在暗处探望。只见那黑影向他这方向迅速奔来，已经距他不过一箭之遥，接着很快便从他旁边过去，邓伟不敢迟缓，暗中跟去。彼此都是好本领，翻墙越屋，全无声息，直追了半条街，看看快到县城隍庙的石垣了，前面黑影似乎发觉后边有人跟着，竟向左折入二府衙门街内，而且脚步加快，后面追来的邓伟，望见黑影加快步子，深恐逃掉，也加快速度，紧追不舍。随即看见那黑影对直跳上二府衙门的院墙，奔向后厅；邓伟发起急来，因为二府衙门内堂舍重重，倘若隐藏起来，不易寻找，况且系官衙所在，深夜又不便惊动衙司，慌忙中，只好下手击打。但是这天出街并未料到要遇见这种意外，随身未带任何器械，急迫中，便从衣袋里摸出一枚制钱，对准前面黑影的上三路掷去，打个正着，只听得那黑影“哎哟”一声，由墙上坠了下去。

邓伟伏在墙头，观察了一会，估计黑影已中了他的暗器，坠下之处，正是二府衙门后堂。可是等了好一会，下面并无动静，也不见衙内有人吵嚷。这不禁引起了他的怀疑，旋即退返巴县衙门，把刚才所见的经过，报告差房步班头脑。

在六扇门内找饭吃的人，对于这类事件何等精明？步班

头脑已经猜测到了其中真象，立即进入后衙靖见大人，禀报机密。吴鼎当即传入内书房，细问详情，并将邓伟一并传到，共同推测其中隐情：认定二府衙内，必有巨盗潜伏，并且在大人内厅也许就是接近的亲随。至于渝城各票号，先后发生各案，至今悬而未决的，必定与此大有关系，如欲破获，必须从这一线索着手追究。

次日早晨，吴鼎即带领仪仗差队，到二府衙门拜会，具报机密。哪知手本传入，竟给挡驾，回说二府大人有病，不能见客。吴鼎更加怀疑，因为二府同知与地方知县同为亲民之官，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昨天曾经见过，为何今天忽然得了急病？便再三要求会见。内堂忽又传出：大人已回走马街公馆。吴鼎听了，越加不肯放松，立即转赴金二府私邸。

到达大门，传帖入内，金二府不能再拒不相见了，便请在客厅会面，由专役两名，左右搀扶出来，头上缠了重重丝帕，掩至双眉，遮住额部。吴鼎见此已明瞭真情，便告辞回县衙。相传金二府原系关外响马（强盗）之流，自己知道不能再立足下去，便具牒呈禀上宪，申请退休回京。至于吴鼎，回县衙之后，也秘密呈报府道。但是，因为金二府是满族旗人，又系皇亲，府道各官都有顾虑，始终不敢把他怎样，也就不了了之。不久，上宪奉朝廷旨意，便将重庆二府迁往江北。

这不过是一种传说，与二府移往江北厅的真象，并不符合，金二府其人，也并无依据可考。保芝舫的一切事迹，地方县志都有着记载，是有历史依据的。

47.7.7—11《重庆夜报》

王 洋 人

今日风行短服，西装也很普遍，但在三十年前，尚视为奇装。民国二十几年间，全市缝制西服的店铺，不过三、四家，穿这种服装的，大都是军政界，以及服务于外国洋行和领事馆的职员。一般商业中人，多是长袍大褂，老式服装。

重庆最早穿西服的华人，出在民国一、二年间，仅只数人。一为白象街“格致大药房”主人罗子昌，即本市号称“被面大王”永兴隆商号梁泽宣的岳丈、医师罗致之的父亲；另一个是“天成福”匹纱号的王和卿；此外尚有在美国领事馆服务的周云甫，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这几个人中，又以王和卿最早穿著西服。

“天成福”是重庆著名的匹纱字号之一，开设在上陕西街中段，即今建设银行左侧，有数十年的历史，在上海设有分庄，趸批贩运，业务较大。最初派往上海驻庄的，便是王和卿，时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因为他是主人之一，也善办事。上海开埠最早，繁华盖于全国，十里洋场，五色迷漫，置身其间，易受感染。内地商家派往驻庄，

俗称“庄客”，是很令人羡慕的阔职，而到上海出庄，更是“优缺”，必须与主人关系密切，深受信任的才能派去。

王和卿在上海长驻数年，一经与外界接触，各种见闻自然比内地不同。早年四川交通不便，十分闭塞，新风气传达不易，一经在上海住留，思想认识自然大大改变了。

为着交往方便，同时又适应当地习俗，王和卿便改着西服。其人体格虽不高大，但却十分魁伟，皮肤白皙，眉毛浓黑，一脸络腮胡须，配上西装革履，很象一位十足道地的外国人了。

民国元年，他由上海回到重庆，主持重庆的业务，为商界各行庄“赶场”（做大宗交易）的时间，上下陕西街一带，各家店号川流不息的有人来往，接洽交易，探访行情。“天成福”是当街门面，王和卿昂然坐在门首的会客室中，不时送客到门口握别，往来行人见他的穿着长像，莫不引起注意。所谓少见多怪，商场中人竟称他为“王洋人”。

当时四川军阀混战，连年不息，各地灾荒频传，重庆城内外，经常发生各派军队战斗，为了维持地方安宁，保全城市生命财产，商界累次出面调停。因此商会经常召集各帮，共同筹集一批款项，作为军饷慰劳。王和卿是商会会董之一（当时商会是会长制，设会董若干人，相当于现在的“理事”），因他颇能言语，擅长交涉，便公推他出城到郊外战场，或巷战时在城内，以商会名义出面发表声明。当时的一般军人，每每误认他是洋人出来接洽，立即停止战斗，听其指示（当时地方发生战斗，经常有本地的各国领事、教会中的外国人出

面调停，一般军阀，慑于外力洋势，深恐撞祸，莫不立即停止战斗)。这样有趣的事，不止一、二次，于是商会竟公推他专门干这件事了。

四川防区制时代，重庆已是商埠，水陆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算是一块“肥肉”，筹款集资，都得依靠本地商会。因此，各军的头头，无不注意着会内的几个代表人物（会董），有时斗争激烈，或急于索款，竟把会董软扣留下来，或干脆逮捕。所以有一个时期，如会长李星五等外出，大轿后面，特地雇用了马弁（卫兵）数人，佩带武器，以防不测。然而王和卿却因很像“洋人”之故，不必担心意外，自行单独行动，毫不拘束。附近城郊一带，住有不少贫苦人民，竹棚篱舍经常发生火灾，一家失慎，迅即燎原，数十百户房舍转眼化为灰烬。每当灾后，例需急于帐济，本地慈善团体，如红十字会、善堂（民办慈善团体）等便筹办一批饼子（锅魁）、稀饭前往灾场救济；王和卿也常代表商会前往，而一班人竟也误认为“洋老爷”到临。于是“王洋人”之名，不但著称于商场，其它各处也这样称呼了。

1947.9.23—25《重庆夜报》

重庆新闻界第一奇人 刘玉声传奇

公孙龙

一

假如刘玉声长在美国，就不会写出闻名世界的“信不信由你”。

刘玉声满脑子都是“信不信由你”的材料，任举一条都可打倒。

在中国，刘玉声写了廿六年的“信不信由你”，但是他的声名不出重庆，读报的人仅知他会写重庆掌故，足够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读报的人，根本不知道刘玉声为何许人。但你提到王秉诚，大家都知道他是位名震川东的说书大家。

刘玉声做了廿六年的新闻记者，但养活他的不是一支生花妙笔，而是一副灵活的嘴舌。他的本业是记者，说书是他

的副业，现在副业的收入超过正业收入十倍，于是刘玉声每天为四家报纸写完文章后，就用王秉诚的名字到茶馆中去说荒唐的蜀山剑侠传。

二

说起刘玉声的身家，也应该列入“我们从前……”之类的。

刘玉声以重庆通著名，他的原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诞生于重庆。那时重庆陕西街一家红得发紫的票号（相当现在的银行）叫萧怡丰，就是他父亲主持的。

不消说刘玉声幼年的生活是很美满的，他在家庭温室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饮食起居有专人服侍，读书学习有专人指导，家庭就是他的一切。

民国十一年“五四”的新风气吹进四川来，触动了拘管在家庭温室中的刘玉声，他浮起一个朦胧的新愿望，到省外去读书。

刘玉声在家中受的教育如何呢？除了国文外，就没其它的了，匆匆忙忙在重庆小梁子英年会补习了几几天英文，刚刚认完廿六个字母，就跑到上海去了，在上海投考学校处处碰壁，那时又无“护航”“写题”之说，刘玉声惨了。

幸好四川另一怪人何鲁，正在上海主持中国公学，刘玉声以同乡关系去拿言语，在中国公学做一名不要学籍的旁听生。

那时刘玉声就开始给重庆一家最老的报馆——商务日报——写通讯，拍专电，开始了记者生涯。

三

刘玉声在上海为商务日报帮忙，原系玩票性质。民国十二年，他回到重庆给商务日报编副刊，才算正式下海。从此他与新闻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到现在足足干了廿六年的穷记者。

廿六年来，刘玉声干过多少报馆，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记者有天同他在茶馆中闲谈，信笔记下他一段谈话。

“例如：商务日报（1922—1923年），电影报（1922年，青年会主办），鸣算日刊（1924、1925年），公益晚报（1925、1926年），东方晚报（1927、1928年，自办），重庆晚报（1928、1929年），国民快报、国民新报（1930年），长江时报（1931年），上海晶报（1931—1937年），南京晚报（1938年），新民报（1939—1943年），新华时报（1946—…），大中日报、重庆夜报（1947—…）。其它只作过短期的报纸记者，多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刘玉声在这廿六年的记者生涯中，他的工作永远是编副刊，写重庆掌故。民国廿六年，他重返商务日报编“本地风光”，主持读者信箱，对重庆任何小事都答得清清楚楚，因此获得“重庆通”的声誉。

四

这不过是二、三个普通例子。

有天，记者偶然和刘玉声谈起重庆投济特捐名列第一富翁黄明安，他就说出黄氏有一怪癖。

据说，黄明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要请医生诊断，要吃一剂药。这习惯已保持很多年。最近一年来，由经常诊断他的医生建议，在家中设了许多瓷缸，凡是吃过的方子，都贴在瓷缸上，里面盛着已配好的药，现在已储存好几百剂药了。从此，医生每天切脉以后，就在储药室内反复推敲，最后用手一指，“今天吃这剂药”，黄氏就把药取来熬好吃了，又把空瓷缸照方配好新药。

“他莫非有病，为何要这样？”记者忍不住问。

“谁知道，这类怪人重庆多得很哩！”

于是刘玉声举出小什字筷子街有位姓杨的，三伏热天要烤熊熊的炭火，玄坛庙有位姓吴的，每次理发要花五天功夫……。

这些奇人奇事，在刘玉声脑海中俯拾皆是，并且随时可以找出证明。

我的天，假如刘玉声生在美国，Riploth的饭碗准定会打破的。

1948年8月11—12日《重庆大众报晚刊》

责任编辑：黎民苏 王钟伦

封面设计：李 巍

重 庆 掌 故

王秉诚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625 插页:2 字数:90千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114·271

定价:0.80元

书号: 10114·271

定价: 0.80元